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第三册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难忘的故事

他为何被判处徒刑

1934年1月6日上午，在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由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开庭对红军将领肖劲光进行了公开审判。参加公审的有红军各部队、中央一级及后方机关的代表。主席宣布开庭后，由书记宣读起诉书。起诉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浒湾战斗则以“丢伤兵”为罪名对肖劲光进行了起诉。起诉书读毕，问被告人有何意见。肖劲光答辩说：“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七十个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原告问肖劲光：“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肖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的武装敌人？”至于丢伤兵的事，起诉书指责肖在八角亭战斗后，没有派部队护送伤员，以致让敌人俘去一批伤员。事实是这样的：八角亭战斗红军伤了300余人，肖劲光派周子昆部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10多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部队掩护下，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因此这个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肖劲光说明情况后，会上原先喊“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光”的群众也没有原来的那种劲头了。最后宣布公审结束，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5年徒刑，无权上诉。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确定开展对肖劲光的斗争，不在于黎川还是浒湾的战斗失利，而是党内反罗明路线斗争的需要，并企图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利嫁祸于人。当时受到王明、博古等打击的不仅肖劲光一人，除了罗明，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等。打击这一大批同志的目的，是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压制党内、军内拥护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这在党内开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为恶劣的先例。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有一段话，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肖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肖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尽管李德在书中对其他问题扯了许多谎，但在这个问题却道出了事情的真谛。这种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敲山镇虎，任意罗织罪名，歪曲事实，甚至不惜“移花接木”，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我党和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

公审判决以后，肖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同志前往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肖劲光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肖劲光以很大的安慰。后来在决定处罚肖时，有的人主张杀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打击肖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王稼祥几次拒绝签字。肖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在2月上旬的一天，一位负责同志找肖谈话，让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肖劲光能够获释，并逐渐受到重用，这是毛泽东等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人的竭力保护，在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前，根本不会留下肖劲光这个所谓“罪犯”，很可能杀掉了，至少也不会让他随军长征。肖劲光是一个幸存者。

延安整风时，我党深刻地总结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造成

的损失和惨痛的教训，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遭受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肖劲光的错误处理在遵义会议时即得到纠正，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在审查肖劲光的代表资格时，中央为肖劲光作了公正的结论，为其平了反。

肖劲光每当回忆到自己身处逆境时，毛泽东对他的保护，都充满着无限的感激之情。毛泽东与世长辞后，他身着戎装当众痛哭失声，并满怀深情地向人们诉说：“我对毛泽东同志有特殊的感情，从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毛泽东同志当作自己敬仰的师长，可以说我是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的帮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青山大学毕业生

1934年春，时任红25军军长的徐海东率部在皖西革命根据地，展开反对敌人的“围剿”作战。3月底的一天，敌第54师1个旅、75师1个旅从南溪、汤家汇气势汹汹地合击而来，面对敌情，徐海东审时度势，定下了“阻北歼南”的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吃掉南路之敌——第54师的1个旅。

南路之敌的指挥官是该敌师代理师长柳树春，这家伙自恃毕业于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经过正规训练，学过兵法，喝了点墨水，清高傲慢，不可一世。这次他决心和徐海东决一死战，想捞上点“资本”，以便回去到上司那请赏，拿掉那让他不舒服的“代理”二字。以平衡他那当了13年团长和4年旅长的不平衡心理。

3月31日夜晚，柳树春率第54师1个旅从南压了过来。徐海东命令1个营阻击北路之敌，其余部队集结在南路。次日天刚蒙蒙亮，在敌发起进攻之前，徐海东又命令2个营向葛藤山西南的小石家沟跑步前进，造成一个大部队运动的声势，以此迷惑敌人。这2个营沿着一个突出的山梁一直跑到山顶后，留下1个排固守，占领地形，加修工事，其余的又顺着隐蔽的山沟悄悄迂回到敌人侧后。柳树春果然把徐海东派出的2个营当成了主力，立即把主攻方向转向了小石家沟山头，就在他督促部队猛扑小石家沟山头时，徐海东指挥的红军主力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两翼。红军那激烈的枪炮声、喊杀声从四面顿起，一时间敌军阵脚大乱，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柳树春所部敌人除逃掉一个营之外，其余全部被歼俘。柳树春也加入了1600余人的俘虏队伍里。

战斗结束后，柳树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这个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正牌军官，垂头丧气，百思不解。忽然，他像明白了什么，冒出了一句：“徐军长，您是黄埔第几期的？”

徐海东摇了摇头没理他，“那您是‘保定’的啰？”

见徐海东还是没有搭话，柳树春认为自己猜中了，竟不知趣地以保定同学的身份想拉近乎，满脸堆笑着问：“您是‘保定’第几期的？”

徐海东火了，把眼一瞪，响亮地告诉他：“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有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的毕业生！”

“青山大学？”柳树春想了想，大惑不解地又问道：“鄙人学识浅薄，委实不知这‘青山大学’在何处？”

“喏，就在这里！”徐海东有力地指向门外的远山近岭。

直到此时，这个趾高气扬的“正牌”军官才似乎明白了什么，没趣地低

下了头。

“少共国际师”成立前后

1933年4月，为保卫革命根据地，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作用，共青团中央决定创立“少共国际师”。

一天，正在前线的肖华，被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叫来，对他说：“经过军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这对当时还不满18岁的肖华，既感到高兴，又有些顾虑，怕自己缺乏独立带兵打仗的经验，不能胜任此重担，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着说：“正因为你还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支部队就更有朝气嘛！”接着又勉励道：“带兵的经验，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战士经过斗争磨练就会逐步成熟。”听着周恩来的亲切教导和鼓励，肖华感到增添了一股无穷的力量，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这副重担。

同年9月3日，“国际青年节”那天，在博古县（今宁郡）跑马坊正式召开了“少共国际师”成立大会并举行了出征誓师，肖华作为政治委员做了誓师讲话。“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5师，下辖第43、44、45团。誓师后即开赴广昌，进行训练。

在当时的红军中，“少共国际师”是一支最年轻的队伍，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左右，其中还有不少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年龄小，但政治素质很高，70%以上是党、团员。为了提高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肖华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训练期间，他们组织开展了“军事训练模范营”竞赛活动，掀起了大比武、大练兵的热潮，使战士们很快熟练了射击、刺杀、投弹、构筑工事等本领。他们着重对部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教育，使战士普遍懂得人民军队的宗旨，明确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从而保持并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方面，他们又展开了具有鲜明的青年特点的政治文化活动，从团到连普遍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体育队等组织，广泛组织识字、读报、政治演说、打球等活动。用以活跃部队、增强集体观念和战斗意志。

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刚结束，便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第一仗是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发现敌人后，肖华和师长陈光决定，立即以一个营分兵迂回，布成一个口袋，将敌人团团围住，枪声一响，战士们勇猛冲锋，奋力冲击，不到两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全歼敌军一个连。随即率部渡过闽江，击溃敌军200多人，前后共歼敌3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少共国际师”旗开得胜，首战告捷，朱德、周恩来等特地打来电报，赞道：“你们初试铁拳，即获取连续的胜利。这更扩大了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更表现了你们是为发展巩固苏维埃的坚决奋斗者。”同时勉励他们在胜利中更要百倍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同年12月，“少共国际师”参加了黎川东南的战斗，和几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借助优势的炮火，轮番向红军阵地组织集团冲锋，年轻的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阵地前留下了上千具敌军尸体。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次年春，又参加了邱家隘战斗。敌人以七倍于“少共国际师”的兵力，向阵地猛攻，炮火纷飞，子弹呼啸，山头上的树木着了火，

泥土被翻了个。该师全体指战员沉着应战，敌机来了钻掩体，炮火弱了上阵地，敌人近了就开枪，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顶住敌人，政委肖华及时组织各级政治干部，进行有力的战场鼓动，号召红军战士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这一仗“少共国际师”打得十分顽强，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其后，“少共国际师”又参加了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7月的大脑寨战斗，8月的驿前防御战。在这些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指战员打得英勇，守得顽强，坚决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作战任务。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和中央根据地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少共国际师”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10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的石城保卫战。这一仗打得很壮烈，部队损失也很大。一年来连续战斗的伤亡，使原来1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这时只剩下5000多人了，为了补充伤亡，根据地各县和共青团组织又陆续输送来2000多名新战士，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这支年轻的队伍，得到了锻炼，显得更加坚强和有力。

1934年10月16日，肖华等率师渡过于都河，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长征一开始，“少共国际师”归红一军团建制，担负着掩护军委纵队，负责后卫的任务，从突破四道封锁线，到渡过乌江、抵达遵义，一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又找到肖华，向他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同时还告诉他，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便于作战指挥，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同红一军团第1、2师合并。谈话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少共国际师”一年半来的战斗业绩，指出它作为红军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经过同敌人反复较量，经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广大指战员已经锻炼成为红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中央军委对“少共国际师”的工作是满意的。肖华回到部队后迅速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决定，作了大会动员。他语重心长地说：“少共国际师的军旗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今天，我们英雄的少共国际师，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它的光荣战斗历程。但是，它的光辉名字和它的革命传统，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少共国际师所代表的中国青年的光荣战斗传统，必将为亿万青年继承和发扬，从而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少共国际师”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后，虽几经整编，但积极执行军委的决定，转战云贵川，翻雪山，过草地，经过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毛泽东同孙毅的一次交谈

1934年6月的一天傍晚，被排斥于党和红军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身着便装，骑着一匹小红马，带着5名随员，从会昌的文武坝，冒着酷暑来到红22师驻地站塘李官山视察。他受到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参谋长孙毅的热情迎接。

毛泽东在主人的陪同下步入师作战室，宾主还未来得及介绍，毛泽东便对周子昆说：“老周啊，你是老井冈山的，我这次来到你们战斗的前线，看看你，也看看同志们。实在是想念老战友呀！”

作战室位于村中靠山坡的一座二层楼上。楼上有里外间，里间，一张小

木桌上放着一盏三个灯芯的油灯，靠墙用门板临时搭一铺位，毛泽东就在此处休息。为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孙住在外间，5名警卫人员在二楼走廊里休息。

毛泽东习惯夜间办公，白天睡上几个小时。他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日上三竿才上床休息，经常精力充沛，毫无倦意。对于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孙毅等人都感到不适应，陪了几个晚上，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直打瞌睡。

在第一天晚饭后，毛泽东询问红22师近期战斗情况。谈话中，他让周子昆找来最近写的6期《战斗详报》，一期一期地进行研讨，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这6次战斗，都是小的战斗，每次都有得有失。孙毅说其中有两次是他带一个团去打的，每次周师长都向团长交代“由孙参谋长协助指挥！”

孙毅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面带笑容地对周子昆说：“你们想想看，叫师参谋长协助团长指挥，团长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们这样使用参谋长有缺陷，问题就出在协助二字上，这样参谋长就不好发挥作用，就难办了嘛！”“你们两次派参谋长带部队上前线，他是刚从红校出来不久，你们当师长、政委的为什么不亲自带队伍出战呢？仗没有打好，回来你们还批评他，这不公道嘛，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师长、政委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如春风化雨，润入心田，连连点头，都说：“主席批评得对，我们一定要改正，争取多打胜仗。”

就这样，用3天晚上分别研究了6期《战斗详报》。孙毅等人对毛泽东如此“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非常钦佩。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般的博大胸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刻独到的超人见解，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给大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每天吃过饭后，要到作战室外间，靠在孙毅的被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同孙毅拉家常。言谈所及，常常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妙趣横生。

“你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籍贯河北，今年30岁！”有些拘谨的孙毅，回答简洁而合乎规范。

“哦，河北，好地方哇。山川粗犷秀丽，人杰辈出不穷。河北省地理位置优越，东临渤海，西枕太行，南接中原大地，北抵万里长城。历史上，人们把河北称作燕赵大地，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毛泽东以亲切的口吻赞美河北这块土地。

谈及历史，毛泽东滔滔不绝，紧接着又说：“有一出戏叫《荆轲刺秦王》，里面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听起来使人感到悲壮慷慨，大义凛然。易水这个地方你去过吗？”

孙毅面带愧色地答道：“没有去过。我的家乡在河北东部大城县，是个穷地方。”

眉宇间流露出诚恳的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噢，大城，为什么叫大城？有大城就应该有小城，这样才对称呀！”

稍加思索的孙毅，回答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国语老师说，大城古称平舒，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以城防坚固之寓意改名大城县。”

“你们大城县出过什么名人吗？”毛泽东进一步发问。

“我知道清朝有个大太监李莲英就是我们大城人。”孙毅不大好意思地说。

“哦，李莲英这个人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他受宠于慈禧太后，还是有一定手腕的。据说他活了60多岁，是在晚上回家路过北京什刹海时被人暗害的。家人找到他时，只剩下了脑壳，四肢和躯干都不知去向了。看来，人还是应该正直本分，不然聪明还被聪明误！”毛泽东侃侃而谈。

毛泽东话锋一转，问孙毅：“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我是宁都暴动过来的！”孙毅说，“前年2月，我带领红五军团红14军200多人，到瑞金参观、学习，你亲自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微笑着连连点头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带队的人原来就是你孙毅呀！”

这次闲谈随便自然，轻松和谐，使领袖和红军指挥员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给孙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看黄花不用伤

秋风萧瑟，战马嘶鸣。

1934年10月的于都成了主力红军突围前的集结地。

湍急的于都河水，绕着南门城墙脚下，漩流远去。整个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与中央机关，骤然拥到于都河边。

策划、主宰这次空前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洋顾问李德，此刻不在于都城，而是在于都的宽田，也就是红一军团的集结地域。他与项英进行长谈时，伍修权充当他们之间的翻译。谈话中，项英提醒李德和博古要注意毛泽东的举动。李德完全同意项英的疑虑。后来，他向博古提出了这个问题。博古却“显得很有信心”，认为“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的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李德对博古轻信毛泽东而深感遗憾，他认为博古将会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没有顾忌李德一伙的算计，为了大局，他从瑞金的云石山径直回到于都县城。他要抓住在苏区的这最后几天的时间，对赣南省的工作作最后的检查布置。

干部团的陈赓赶来看望，仔细盘查，发现还缺一床棉被。

毛泽东说：“他们大概去供给部领了。”

正好，吴吉清去野战司令部领毛泽东的东西，两手空空回来。他满肚子不高兴嚷着：“他们把毛主席给忘了，没有领东西的户头。”

原来，下午吴吉清和胡昌保去供给处，找到刘副官领东西。

刘副官问：“你们哪个部队，领什么东西？”

吴吉清回答：“我们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领取毛主席行军用的东西。”

刘副官翻着本子，找了老半天，回绝说：“这里没有毛主席的名字，领不到东西。”

“怎么回事？我去查一查。”陈赓说完就走了。

其实，并不奇怪。原来李德、博古压根就不准备带毛泽东突围，让毛泽东留下来，省得碍手碍脚。后来，好些人说：“一定要把毛主席带上。苏维埃搬家，岂有丢下毛主席之理。”说归说，事实就是没有毛主席的名字，说明有人执意要毛泽东留下。

后来，也不知供给部向谁请示了，刘副官派人通知吴吉清、陈昌奉去领

香烟和棉被、电池。

吴吉清与陈昌奉抱回一堆东西，向主席汇报说：“刚刚通知，主席及有关人员编在三梯队！”

这三梯队是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和运输大队以及附属医院组成，除了毛泽东和警卫班的十几个人外，其余的尽是些马夫、挑夫、担架员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

“怎么这样编队？”胡昌保不解地发牢骚。

“编在哪都可以。队伍出发后，还不是大家都挤在一起。”毛泽东自我安慰道。

吴吉清说：“陈赓要我们跟干部团走，属第四梯队，宋任穷负责。肖劲光、罗明、谢唯俊他们都在干部团。大家都熟悉。”

“还是先在三梯队吧，上了路以后再说。”毛泽东笑笑回答。

军委命令规定：红一、三军团渡过于都河的时间是10月16日晚；中央纵队渡过于都河的时间在最后一天——10月18日傍晚。

10月16日，恰好又是重阳日。

今年的重阳，虽然也有老表在油炸重阳米果，也同往年一样遍地野菊，红叶满山……但人们的心头却被浓重的战争气氛所笼罩。

突围转移的红军将士，极少有人想到今天是重阳日。他们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尤其是一、三军团的指战员们。今晚，他们就要从于都出发了。

毛泽东突然想起今天是重阳，因为赣南省苏区政府的地方干部给他送来一包油炸重阳米果，还给他带来些于都特产大盒柿。这种大盒柿，顶平扁圆，状似南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当地都称它为“磨盘盒柿”。他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柿子。

这天晚上10时左右，毛泽东要警卫班长胡昌保和吴吉清同他到于都河边看看。

毛泽东蹲在河边的大榕树下，朝前望去，只见宽阔的河面上架起一座长长的浮桥。河岸边，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在为出征的亲人们送行。浮桥上，红三军团的队伍，正源源不断地通过。

望着这一切，他想起了6年前在这河边说鱼的情景。那是1929年4月11日的傍晚，开完前委联席会后，他和陈毅、谭震林、江华等人漫步来到这西门外的于都河边，谈论着水中的鱼睡不睡觉的问题。当时，他曾说过：“水中的鱼，也是要休息的。世界上，生与死、动与静、失败与成功，都是相对依存的，不是绝对不变的……”

这些话，当时虽是即兴说出，但他至今认为没有说错。

用门板、民船、蔑缆扎成的临时浮桥，被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踩压得发出“扎扎”声响。

于都河水还是那样漩流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似乎有些伤感。他怕再也见不到一些老战友了。

不是吗？中共“一大”建党时的代表中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4位在中央苏区。他们的命运后来都很悲惨：董必武随部队走，他的爱妻因身体检查体重不够被迫留下，从此成了永别；毛泽东的爱子毛岸红，才3岁，无奈留在叔叔毛泽覃身边，最后泽覃战死在瑞金，岸红失散在荒野；陈潭秋也被留下来，几次险些丧命；更有何胡子——何叔衡，因支持毛泽东

而受到压制，留在苏区，与瞿秋白一起过封锁线时，被敌人包围，他最后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留在苏区的人们中，有相当一批是博古用来排除异己的牺牲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支持毛泽东路线的，毛泽东同他们也熟悉。瞿秋白突围时不幸被俘，蒋介石密令处决，最后从容就义在长汀的罗汉岭下；周以栗身染肺病，在转移途中被搜索的敌人击毙在担架上；刘伯坚在于南突围时被俘于唐村深山密林中，关押在大余监牢，移狱时高唱“带镣长街行”，最后遭杀害，葬身于梅岭；原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在打游击时被敌人枪杀在广东龙川的鸳鸯坑……

想到苏维埃的前途，想到红军的命运，想到可尊敬的苏区人民，毛泽东真舍不得走，不忍心离开这块充满生机与灵性的大地。然而，面对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大势所趋，这个缔造了党、缔造了军队、缔造了中央根据地的伟人，只有服从。

10月18日，暮色苍茫。毛泽东一行20多人离开住地，穿过大街，出于都城东门，沿河岸往上走了两里多路，来到中央纵队的渡河口。

吴吉清和陈昌奉好不容易才从涌动的队伍中找到“红星”纵队第三梯队。

岸边的人们举着火把，在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发的队伍祝福送行。

毛泽东身后，走着他的坐骑——土黄色的战马。这匹从闽西军阀郭凤鸣手里缴来驯服了的战马，跟着他踏遍了赣水两岸和闽山崇林。马背上驮着的是毛泽东心爱的书籍：《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三国演义》……还有毛泽东写下的文稿，四部大型的农村调查，无数的作战方案，还有诗稿。不，诗都在他的肚子里，随时口占壁题。毛泽东边走边抚摸鬃鬣马鬃，左右看看吴吉清、陈昌奉，突然联想起了眼下多像唐僧师徒西游，过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正果，白龙马驮回了真经。仔细想想，却又根本不像：眼下是目的不明确的行动，像是仓惶溃逃的无头苍蝇，去何处取经？“真经”在马背上，在苏区军民的实践中。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革命真经，已创造了出来，却不为当权者认识接受，岂止束之高阁，简直纸上谈兵，本本主义，钦差大臣满天飞。创造真理要高昂的代价，接受真理也要有痛苦的过程，谈何容易！

毛泽东走了，他带着5年零9个月的征尘。

红军走了，留下了无限的思念，留下了“骨”、“肉”、“情”。

是啊，留下了红军将士对红色共和国的无尽思念：人们多么想再看一眼叶坪的红军塔、沙洲坝的大礼堂，再喝一口甘甜的红井水，再给共和国的国旗行一个庄严的军礼。可红军走后不到20天，瑞金就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塔被炸，大礼堂拆毁，红井也被填平……好在共和国的大印，完好地存放在毛泽东的铁皮公文箱中，跟着长征队伍前进，印在了红军将士的心里。

是啊，留下了堆堆白骨；国民党、还乡团复辟，“石头过刀人换种”，中央苏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数十万计，仅瑞金一县就18000多人！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更是青山处处埋忠骨。解放后，人们四处寻找方志敏、瞿秋白、毛泽覃、古柏、何叔衡等人的遗骨，以安抚这无数的忠魂。

是啊，留下了多少红军的后代，留下了多少襁褓中的婴儿：这是红军身上的血肉啊！毛泽东、林伯渠、邓子恢、刘伯坚、胡海、李涛、陆定一、方志敏、陈正人、邵式平……他们的孩子都留下送给了群众。马前托孤，行前寄养，孩子的哭声，撕碎了他们的心！

是啊，还留下了悠悠深情，留下了割不断的情爱：送郎出征，盼郎早归，盼得双眼欲穿，两鬓霜白。既有夫妻情，还有母子情、骨肉情。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老人，留在苏区流落中被敌抓获，关进了铁窗；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杜秀，从于都化妆，逃到赣州水西，隐匿庙里当道人，苦度残生。

瑟瑟夜风吹乱了毛泽东散乱长发。他用五指梳了梳，将平时很少戴的八角五星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他停住了脚步，回身远眺于都县城，回望苏区的山，苏区的水。他像在留恋地回望，郑重地告别。然而，一切融进夜色中。

他思绪万千：前天重阳夜，毫无睡意，打开铜墨盒，准备写诗，一时无从下笔，信笔录下在上杭临江楼写的《采桑子·重阳》。当年离开红军怀念战场，原词是以“但见黄花不用伤”一句作结。过了5年，此时此刻重写此词，他再三琢磨推敲，改一改，把上下阙倒过来，顿生新意：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寥廓江天万里霜”。他刻意改用这一句作结，用以记叙眼前的此情此景，确是十分贴切：前景迷惘却很广阔，脚下正迈步长征第一桥，红军正在夜渡于都河，虽不是春光，但革命的春天到来，并不遥远。

夜风凉意袭来，毛泽东扣起了上衣领下的两颗扣子，点上一支烟，猛然他又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牧咏重阳的两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不用登临叹落晖”。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也没有休期。到了晚年，他写《读史》，竟引用了此句：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战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九月初九，两个最大的阳数，故名“重阳”。“九”这最大的阳数，竟奇特地联系着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

1935年9月9日，长征路上张国焘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幸好被叶剑英发现，毛泽东看到密电连夜出发，侥幸脱离险境；

1936年九月初九（重阳），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949年农历九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农历九月，赫鲁晓夫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定书，中苏关系破裂；

1971年9月9日林立果企图刺杀毛泽东，布置用四枚火箭筒攻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

1960年9月毛泽东接待来访的英国元帅预测自己的寿命时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我们，正好84岁。

机智勇敢的女电话兵

1934年7月的一天晚上，川陕苏区陈家坝红军部队通往背坝的电话线断了，女游击队长彭珍便派女电话兵张富智去查线，并派两个女游击队员同她一道前往。她们出发后不久，电话铃就响了。彭珍心想：这些女孩子，真行！可是，过了一会电话又不通了。过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仍不见查线人回来。接连过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她们的踪迹，杳无音讯。同志们还以为她们牺牲了。

一天晚上，彭珍正在屋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张富智和两个游击队员满身污泥满面春风地回到她的面前。她们带回了4支“汉阳造”步枪和几百发子弹，身后还有4个国民党兵。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这几个丫头到哪里打仗去了？

“你们到哪里去了？”彭珍急不可耐几乎带着责备的口吻问道。“到敌人那里去了，侥幸又逃了回来。”张富智兴奋地回答。她的眼睛充满血丝，面部浮肿，声音沙哑，身上的衣服破了，还带着片片血迹。

“这是怎么回事？”彭珍吃惊地说。“你讲吧，小陈！”张富智对小陈说，“我招待这几个弟兄去。”说罢，她把那4个国民党兵领了出去。小陈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摸了40多里，净是大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是风，又是雨，路滑难走。到了潮水坝附近的山上，我们发现拉在树上的电话线断了，这是敌人有意破坏的。张富智爬上树去接线，刚接上线头，一群敌人围了上来。看样子他们是埋伏在这里，等待捕捉我们的战士。冷不防，我们被敌人抓住了。

路上，张富智悄悄对我和小章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保守秘密。”她的声音虽然很低，但是沉着、坚定。

当晚，我们被关到楼子庙附近一个村庄的小屋里。头一个被带出去受审的，是张富智。审问室和关押我们的屋子仅一墙之隔，我和小章耳朵贴着门缝偷听。只听见一个高嗓门的人喊道：“说，快说！不说就打死你！”没有回答。接着传来一阵棍子响，一阵叫骂声。过了许久，听不到动静了。小章流着泪，悲哀地说：“她被打死了！”我也是这样想。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张富智姐姐愤怒的声音：“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这时，敌人吼叫着：“灌！狠狠地灌！”敌人开始给她灌辣椒水。我们只能想象出张富智咬紧牙关坚不吐实的情形，却听不见她的声音。

天亮了，两个敌人架着胳膊把富智拖进来，扔在地上。我们急忙把她扶起来，在她胸前抚摸半天，她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说：“你们怕吗？”“不怕！”我们异口同声说道。“对！不要怕。”她抓住我和小章的手说：“敌人没有别的本事，就这两下子。任凭怎么拷打，只要我们不说，他们就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共青团员，就是死了，也不能背叛革命，背叛党！”她的话，更鼓起了我们的斗争勇气，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就这样，我们每天受审，每天遭拷打。他们越打，我们的决心越硬。三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宁可死，绝不向敌人屈服。

被关押的第三天，张富智又被拉出去，这是她第五次被审问了。临出门，她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说：“我再也不让他们折磨了，干脆来个痛快的吧！”她走到敌人跟前，破口大骂道：“你们这帮混蛋，害人精，刽子手，快点枪毙了我吧！你们再问，我还是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贴在门上，屏息着，等待着。过了一会，听见敌人说：

“不，你不要那样固执。你还年轻，我们是不会杀你的！你说出了红军的主力，他们的指挥部在哪里，我们就给你钱，很多的钱，就送你回家……”

“不要！不要！留着你们的臭钱买棺材吧！”张富智大姐高声地咒骂着。

敌人看张富智软的一手也不吃，只好又拿出硬的一手，毒打她，用冷水灌她，直到她昏了过去，才把她拖回来。

敌人软硬兼施，没得到一句对他们有用的话。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把我们关押起来，暂予看管。

每天敌人的通信班长给我们送饭。这人常常和我们谈话，看样子人很忠厚诚实。张富智向我们耳语道：“咱们在这个班长身上做做工作，说不定还有希望。”她主动和那个人搭讪，问他家里的情况。那人说，他家是雇农，父亲为了给他躲壮丁，被国民党杀了，他很不愿在这里干。我们还经常向他宣传革命道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有时还帮他做点缝缝补补的活。后来，他就偷偷拿来一些烧酒、黄表纸，让我们治伤。

一天，那个班长又拿来双破袜子，叫我们替他补。张富智趁机对他说：“班长，你说你不反对红军，就放了我们吧！这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也是给你自己留条出路！”他沉默了一会，轻轻地摇摇头说：“这会儿不是时候，搞不好，你们逃不掉，我们全班要被杀头！”

“那你也跟我们走呀！”张富智劝道。那个班长摇头不语，慢慢地走了出去。

我和小章都担心会坏事。张富智认为，不会出事，当白军的也想为自己找点后路，何况他又是穷苦人出身。

一天夜里，我们正要入睡，听见远处有枪声。那个班长匆匆跑来，小声说：“红军打楼子庙了，司令部大部分人都出去了，这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他们三个也不想在白军干了，咱们一块走，跟你们投奔红军去！”

我们听了又惊又喜，几乎要喊出声来。张富智望着那个班长说：“此话当真！”“我发誓，骗你们不是娘养的。我是个穷人，真心想投奔红军。”他语气坚定而又认真地说。“那好！”张富智说：“你要是真心投奔红军，就把枪交给我们。”

那个班长犹豫了一下，说：“好，把枪给你们！”接着他叫来了三个弟兄，把枪给了我们。张富智见枪已到手，对那位班长说：“我们趁司令部空虚，冲进去打它个稀哩哗啦，出口气好不好？”那个班长说：“这可使不得，搞不好我们都逃不脱，现在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们一共这几支枪，个个浑身伤痕累累，怕打起来无便宜可捡，就同意了那位班长的意见，抄小路走了。

走到村口，要通过敌人的一个岗哨。张富智把两支没有子弹的枪交给那位班长，让他走到哨兵旁边。“干什么的？”哨兵大声喝问。“司令部通信班的！有紧急任务。”班长也大声地回答着。

天黑，看不见，我们加快脚步，从哨兵旁边跑过去。当我们跑出一段距离后，哨兵似乎觉得我们行迹可疑，便叫喊：“站住！站住！不站住开枪了！”我们没有回答，向前一个劲地猛跑。“砰砰”两声，敌人哨兵开枪了，但是，我们已经走远了。敌人的枪声权当给我们送行了。

小陈讲到这里，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并向门口点头示意。这时，彭珍才注意到，张富智已站在门口，她那双有神的眼睛放射出可爱的光芒。彭珍不由得扑过去，紧紧地握住张富智的双手，又深情地把她搂在怀中。

左权奇兵出城口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乱转，为解燃眉之急，急忙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湖南军阀何键火速出兵，在桂东、汝城、仁化一带设置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

虽然蒋介石下令调集兵力，但是无奈陈济棠为阻止红军进入广东，已将南路军主力撤至大庾、南雄一带，仁化地区仅有粤军1个旅；何键部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来不及向湘粤边靠拢，汝城只有新调来的其第62师一部和当地一些民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队还远在赣江以东。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仁化方向前进，从这里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是从红2师6团袭占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开始的。城口是仁化县北部山区的一个城镇，位于湘粤两省的交界处，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的一个山隘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4年11月1日下午，红一军团2师6团1营营长曾保堂接到团里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团司令部去接受任务。曾保堂一听说有仗就来劲，马上带上通信员出发了。

一到军团部，左权参谋长就说：

“曾保堂你来的好快啊！来来来，你看——”

接着，他指着地图说：

“从这儿往西220里有个城口镇。镇子上有民团七八百人把守，军团命令你们营，黄昏以后出发，在明天天黑以前赶到那里。我们如不能抢先占领城口，敌人的先头部队就会赶到，那对红军将是十分危险的。你回去以后立即让部队做好准备，吃饱饭，带上一天的干粮，黄昏以后行动。”

曾保堂算了算时间，问左参谋长为什么要等天黑才能下山。

左权参谋长告诉他：

“对面山上有敌人，现在下山，太阳一照人影子很清楚，容易被敌人发现。下山五六里有一条马路，你们插上马路后就上刺刀，成4路纵队跑步前进，大摇大摆地走。如果沿路碉堡里的民团问起来就说是中央军，横一点，不要和他们纠缠。要快，一定要在明天天黑以前赶到城口。城口的敌人有200多支枪，虽然是一些民团，也不能麻痹。那里是个洼地，占领了镇子要立即夺取四周的山包，占领制高点，防备敌人的反扑。另外，应马上派人向我们报告情况。”

“是！”曾保堂大声回答。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曾保堂很有信心，高兴地说：

“曾保堂，你们营是6团的第1营，几次单独完成任务都很好，要保待你们的光荣，克服一切困难，按时拿下城口。”

说到这里，聂荣臻政委的脸色严峻起来：

“派你们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们目前的处境你可能也清楚。前面，有几万敌人的拦截部队，在信丰被甩开的敌人又跟上来了，我们必须赶快走。可是往哪里走呢？往南，敌人摆下了口袋，往东，他们张开了网子，往西、往北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山。眼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西北城口插到湖南去。城口地处3省交界，是出入湘粤赣的咽喉要地。据侦察，敌人的两个军

正日夜兼程往那里赶，妄图扼住咽喉，把我们堵在这狭长的通道里聚而歼之。因此，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敌人主力到达前夺取城口，使部队从这个唯一的口子突出去。保堂同志，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你回去一定要把这一点给同志们讲清楚。”

“是”，曾保堂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哪怕我们营拼得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按时拿下城口！”

“好”，聂政委露出欣慰的微笑，又交待说：“拿下城口以后要马上向我们报告！这次行动十分艰巨，我已给6团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打了电话，让他们派干部去协助你。路上要做好鼓动工作和掉队战士的收容工作，占领城口后要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把惊跑了的群众叫回来，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打破反动派对红军的诬蔑，播些革命的火种！”

“政委，我是个粗人，冲锋打仗还行，做群众工作怕……”

“不行，是不是？”聂政委严肃地说：“谁从娘肚子里一生下就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不会就学嘛！天底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情呢！我们红军不光是打仗的，我们还是宣传队，还是生产队嘛！毛主席在苏区时讲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没忘！”曾保堂有些不好意思。

聂荣臻政委接着说：

“没忘就好！刚才参谋长交给的任务都记住了？”

曾保堂答：“记住了。”

“那你重复一遍！”

曾保堂把任务复述了一遍，并打电话让营部通知各连做饭准备执行任务。然后走到军团长林彪面前，问他还有什么指示。

林彪好像正在思考别的问题，挥挥手，说：

“政委、参谋长都讲得很清楚了，按他们的命令执行吧！”

曾保堂接受任务后便匆匆赶回营里。团里派来的唐振旁参谋和俱乐部主任余勋光以及团侦察排已经到达。

余勋光主任对曾保堂说：

“王政委派我们来，让我暂时负责政治工作，配合你们完成奔袭城口的战斗任务。”

11月里，天黑得很早，6点不到，太阳便沉下去了。

曾保堂看太阳一下山，立即命令部队按侦察排、重机枪排和1、2、3连的序列出发。战士们早就在看着太阳，盼着太阳早点落山，命令一下，便似一支离弦的箭飞下山去。

擦黑时分，部队上了马路。按左参谋长的指示，曾保堂命令部队上了刺刀，排成4路纵队跑步前进。

走了不远，就看到远远的有一座黑乎乎的确堡立在路旁。

一夜急行军，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灿烂的朝阳从远远的山际升起，把万道金光洒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上，洒在红军这支坚强的队伍里。

下午6点左右，部队终于赶到了城口。

曾保堂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仔细听了听镇里的动静，觉得不像驻有大部队的样子，悬着的心才似一块石头落了地。

借着夜幕降临前的光亮，曾保堂细细地打量一下这个镇子。镇子上约有

几百户人家，一条五六十米宽的河由北向西从镇前流过，镇后也有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环绕，镇中则有道五六米的水渠穿镇而过，把镇前、镇后的两条河连在一起。整个镇子处在水的环抱中。

镇前的大河上，有一座窄木桥，一个民团哨兵正不经意地在桥边晃悠。镇子两侧，两座五六十米高的山岗相对而卧，形成镇子的两个犄角。

曾保堂按原定作战计划，命令侦察排夺取桥头阵地，和3连一起解决镇内的敌人；1、2连立即迂回包抄两边的山岗，摧毁敌人在山上的碉堡。

侦察排根据营首长的意图，立即指定十几个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桥的上游和下游泅渡过河。

战士们下水后，曾保堂决定继续迷惑敌人，先炸桥，炸不成再用武力夺取。敌人桥头哨兵见河对岸突然跑出一支队伍来，惊慌地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打开五节手电，刺眼的光柱在我军战士的脸上扫来扫去。

几个侦察员厉声骂道：

“照他妈什么？再照，老子崩了你。”

“你们是什么人？”那家伙不甘示弱。

战士们更横：

“老子是中央军，让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

说着，战士们“登登登”跑上桥直闯过去。

敌哨兵把枪栓一拉，厉声喝道：

“不许走，再走我就开枪！”

然后，敌哨兵转身朝棚里喊道：

“班长、班长，中央军弟兄要过来，让不让过啊！”

棚里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问一下他们，是不是陈长官的队伍！这样吧，让他们先过来一个，老子问问清楚。”

“是。”那个哨兵转过身来朝红军战士喊道：“你们听着，先过来一个。”

“一个就一个。”

已经上桥的一个红军侦察员气呼呼地提着枪往前走。在他身后的两个侦察员也机警地跟上去。曾保堂立即示意机枪准备掩护。

走在前面的侦察员一边走一边骂：

“叫你们班长出来，真他妈瞎了眼。”

敌哨兵见对方来势很猛正不知所措，我们的英雄甩手一把把他撂倒在地。

与此同时，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在草棚里爆炸了。原来，泅渡的勇士已经上了岸。

曾保堂见夺下了桥头阵地，当机立断把手一挥，战士们便似猛虎般扑过河去。刹那间，冲锋号声伴着枪声、手榴弹声和战士们威武的呐喊声，在古镇上空响起。

前后不到3个小时，红军俘虏了300敌人，缴了200多条枪，控制了镇子周围所有的制高点，胜利结束了战斗，为大队红军的安全通过作好了准备。

曾保堂命令部队整修敌人留下的工事，准备打击随对可能来犯之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红军巡逻队抓到5个形迹可疑的人，一审，原来是敌人的便衣侦探。

敌侦探供认：昨晚6点钟，敌人的1个师已行进到离城口20里的地方，

隐隐约约听到城口有枪炮声便停止了前进。后来碰上从城口山上溃逃的民团士兵，才知这里已被红军大队占领。敌师长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令部队连夜回撤 40 里，同时派便衣来侦察情况。

听俘虏说完，曾保堂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如果红军昨天迟到两小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曾保堂把敌人重兵距这里只有 60 里的情况立即通知部队，要求战士们做好一切准备，拼死保卫城口，并和唐参谋一起研究了详细的阻击计划，调整了兵力部署。

就在红军准备和敌人拼死战斗的时候，哨兵报告左权参谋长带着侦察连到了。曾保堂一听，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黄昏，红军主力抵达城口，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咽喉要地，奔向湖南。之后，分 3 路由汝城、城口之间陆续向西挺进。11 月 8 日，全部通过了敌人的第二封锁线。

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后，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从良田、宜章之间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有湘军第 15 师和粤军两个团驻守。

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宜章以南前进，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宜章以北前进，军委纵队、五军团、八军团和九军团分别随后跟进。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摆在前面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部队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的速度减慢了，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

这时，湖南、广东敌军在蒋介石的严令催促下，乘机从两侧向红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衔尾紧追。

由于敌人三面逼迫，一方面军全军和军委纵队都挤到一条路上来了，情况十分紧急。

此时，红 1 师正在粤汉路同广东敌人进行战斗，一军团首长打来电话，令师长李聚奎带 1 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

命令要求：动作要快、不得延误。

师长李聚奎是一员虎将，能征善战，解放后曾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他当机立断，令 1、2 团继续抗击侧面敌人的进攻，自己带红 3 团从阵地上撤下来，赶到全军的前头。

就在这里，李聚奎见到了随军委纵队行军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李聚奎带着 3 团上来了，没等李聚奎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就从路旁的一块石头上站起，追上前来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

李聚奎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他们是来担负先锋开路任务的。接着，周恩来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划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并告诉李聚奎在前进中在哪里放 1 个排，在哪里放 1 个连，以担负警戒。然后周恩来又以沉着而坚定的语调嘱咐说：

“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一边领会首长意图，一边考虑如何指挥队伍前进，并随着周恩来手中红铅笔在地图上所作的标记，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然后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才能收拢这些部队。李聚奎感到部队“撒”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怕难以收拢。

周恩来看出李聚奎的顾虑，就笑着解释说：

“你不要担心这样会把你们部队分散了，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这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的任务。”

周恩来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接着对李聚奎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

最后，毛泽东又强调说：

“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李聚奎带红3团受领了前锋开路的任务后，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重兵围追，中央命令红一军团坚决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确保中央纵队左翼安全；命令三军团迅速拿下宜章城，防备湖南军阀从右翼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确保中央纵队右翼安全，以掩护中央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长征开路先锋刘亚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而长征之路又是何等的艰难！

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给失败的红军以喘息的机会。妄图利用双方众寡悬殊的有利条件，于重山复水之间，险关隘口之隙，围、追、堵、截，将红军置于死地，不负天赐予他千载难逢的良机。

处于被动的红军，只有全力以赴，背水一战，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团结一致，粉碎蒋介石的企图，才有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要突破敌人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先锋部队打得怎么样，“枪头”硬不硬，锐不锐，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为红军开路的重任，压在了红一军团第2师身上。红2师政委刘亚楼（师长为陈光）时年23岁。长征后期，他改任师长，依然是为红军开路的先锋。

几年的残酷环境，早已把刘亚楼锻炼成一位坚韧不拔、视与苦难作斗争为乐趣的硬汉子。在革命危难之时，他担起了这副担子，决心不辜负党和全体将士的重托。他和全师指战员一道以忘我的牺牲精神，过人的胆略才智，前仆后继，为红军奋勇开路，斩关夺隘、破城渡河，吃尽了人间罕见的辛苦，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长征一开始，红2师就初试锋芒，旗开得胜，攻陷金鸡，飞渡信丰河，穿越赣州—南雄公路，一举杀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防线。

11月初，红2师乘胜扬威，攻下天马山，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同月中旬，红2师再接再厉，连续作战，破临武，渡潇水，又突破了第三道防线。

下旬，红2师风雨无阻，不畏艰难，顽强破敌，终于抵临湘江。这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防线，天险加重兵，必欲置红军疲惫之师于死地而后快。战斗空前激烈，炮火连天，反复争夺。红2师再显英雄本色。抢渡湘江

成功以后，不惜一切代价，奋力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12月初，毛泽东关于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被军委领导人采纳。消息传来，红2师群情振奋，士气高昂。中旬，突破黔敌防线，吓跑黎平守敌，进占黎平，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士气更盛。

此时，红2师受命：进军黔北，夺取遵（义）、桐（梓）等地。刘亚楼与师长陈光率部西出黎平，如秋风扫落叶，连下剑河、黄平、施秉等10余座县城，然后于12月底直抵乌江。

面对两岸层峦叠嶂、水流汹涌湍急的乌江，刘亚楼及时提出了振奋军心的“突破乌江，拿下遵、桐，用胜利贺新年”的战斗口号。经过周密的侦察、部署，红2师终于在1935年1月3日强渡成功，将守敌1旅击溃。随即与后续部队架设浮桥，为大军过江创造了条件。

接着红2师各团分兵行动：红6团巧取遵义城；红4团正面强攻加迂回夹击，先夺天险娄山关，继攻占桐梓城。消息传开，全军振奋。尔后，红2师、红1师与红五军团一起，布下遵义北、南两道防线，使中央率大部队进驻遵义后，得到了长征以来还从未有过的休整。旋即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会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挥戈北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宛若游龙，摆脱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追堵。先锋红2师率先通过彝族区，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大渡河边。左权和刘亚楼奉命在大树堡率红5团（第2先遣团）佯攻，策应在安顺场抢渡的第1先遣团，引来大批敌人在河对岸的富林镇集结，使得安顺场渡河较为顺利。

安顺场抢渡成功之后，刘亚楼和陈光率红2师马不停蹄，奋勇北进开道。攻占天金、芦山之后，单衣薄衫、腹中空空的红军将士，以前无古人的大无畏精神，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夹金山，征服了沼泽泥泞、陷阱重重的草地……先锋师如不卷刃的尖刀，越战越勇，所向披靡：激战腊子口，再夺险关，翻越六盘山，直抵陕北。再占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军还不及喘口气，敌人便以东北军5个师的重兵发动进攻。已改任红2师师长的刘亚楼同政委肖华奉命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病中的毛泽东主席坐着担架来到部队出发阵地，看望劳苦功高的红2师将士，告诫此役关系到“大场合”（搞根据地）的成败，大家无不为之动容，振奋。再次充当先头部队的红2师不负众望，与兄弟部队一道顽强奋战，歼敌1个师又1个团，弄到了“大场合”。这就是被誉为“奠基礼”的直罗镇大捷。

接着，刘亚楼率红2师东征，横渡黄河，在吕梁山区，三晋大地，横扫阎锡山军队，一直打到南同蒲线一带，使国民党朝野又是一片惊慌。

刘亚楼和红2师功垂寰宇，永远镂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统战“南天王”

1934年10月初的一个清晨，在绵水河畔崎岖小道上，一位红军将领策马扬鞭，迎着初升的朝阳，向瑞金急驰而去。他，就是当时在粤赣军区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此刻，他是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去接受和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周恩来拉着满头大汗的何长工，亲切地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

去和他进行秘密军事谈判，这是一个争取陈济棠的极好机会，我们可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进行统战工作，打破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美梦。周恩来接着说：“朱德同志已给陈部写好了复信，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到陈管区去完成这项特殊任务。这是中央对你们的信任，到那里要沉着勇敢，见机而行。”周恩来说完，在一旁的参谋长叶剑英嘱咐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在于沉着灵活。”最后向何长工交待了联络密语。

“南天王”是陈济棠的绰号。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以后势力日长，成为广东一霸，人称“南天王”，他非蒋之嫡系，与蒋常有摩擦，同床异梦。他知道，蒋介石阴险狡诈，这次“剿共”，给他总司令头衔，实为把他绑在他的战车上，替他卖命，消耗他地方派实力，蒋介石想借他打红军，并让红军来消耗他，真是“一石两鸟”机关算尽。为此他不愿为蒋卖命，对蒋“剿匪”手令，常打折扣。他认为，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目的是把红军逼到广东来，而且把嫡系顾玉堂派到闽西南地区，威慑广东，就此，陈也不让步，部署在粤东的兵力大于入赣的兵力。

在红军和共产党发出抗日反蒋号召，特别是他的部队在向红军进攻，遭到打击后，陈早在心里盘算想法子与红军拉上关系，进行和谈，互不“侵犯”。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便设法与他拉上了关系，借他向周恩来传话，表明愿与红军和谈的愿望，不久，陈派来一位姓李的代表，此人系黄埔系学生，自然认识周恩来，详传了陈要与红军谈判的意图。中央决心抓住此机会，派潘、何去和陈部密谈。

此前朱德已致信陈济棠，信中写到：

华北大好山河，部分已沦之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军事分界线、帮助购买军火、武装民众反蒋反日等诸条。

就此，何、潘身负重任，将赴陈部谈判。10月7日，何潘二人来到筠门岭赤区和白区交界处，陈济棠为此次密谈准备可谓周全：在交界处羊角水，陈部独1师第2旅旅长严应鱼，率特务连一连人早已列队等候多时，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保卫工作，路边还放着两抬大轿。

在他们的接应护送下，一路畅通无阻，轿子抬到罗塘镇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这是独1师2旅所在地。陈济棠派来的代表是少将参谋杨幻敏和两个师长，一个是独1师师长黄任棠，另一个是独7师师长黄质文。见面后，何长工递上朱德介绍信。黄师长接过信，只见信中写到：黄师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翌日，在楼上一间会议室里，双方开始了密谈，经过三天三夜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防区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后撤40里等项协议。

在谈判取得成功之际，粤军电台转来周恩来向何、潘发来的电报：“长

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何、潘行前，已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并准备转移的意图。得此消息，何、潘知道，红军将要开拔。陈部谈判代表不解其意，询问何意，何长工答：“这是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何、潘急返会昌，此时，军委已转至于都，何、潘速去于都，向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作了汇报，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说，这一统战成功，对中央红军突围将起重大作用。

果然，在红军战略转移中，这一谈判协议使红军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令南路陈济棠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向中央苏区的进攻，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广筑工事、要口设防。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根据敌之部署，红军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敌军封锁，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属部还基本信守协议，稍加抵抗，即全线撤退，至25日，红军顺利突破了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蒋电令后，陈济棠令李汉魂率独3师、独立警卫旅在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中央红军决定从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第二道封锁线。在敌第二道封锁线中，陈部高级军官大都知道与红军的协议，有的军官信守协议，当发现下属部队与红军交火时，即责令撤出战斗，在城口重要关口，李汉魂只派了一个连防守。为此，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没遇到粤军大部队的死守阻击。

接着，红军勇往直前，向九峰山转进，攻占良田、宜章，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

剿灭红军心切的蒋介石眼巴巴看着红军突过陈济棠设立的三道封锁线，这时，他如梦初醒，立即电斥陈济棠：“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之污点。”并令其集中兵力堵截，否则“执法以绳”，蒋介石不会认识到，这是他坚持打内战的主张不得人心，共产党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

陈树湘自断柔肠

乱世干戈动四方，天骄一代战玄黄。
如斯苦斗埋哀怨，被迫长征起祸殃。
堵截围追初得势，攻杀突走屡伤亡。
前程未卜迷要津，后计无施转恐惶。
落难英雄肠自断，名垂青史永流芳。

这首七言排律，表达了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濒临绝境的不满、痛惜及对红34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自断柔肠英勇悲壮之举的赞颂。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于1934年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境进行截击；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王家烈派部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

区。

何键随即发布了“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成5路“追剿”军，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韞珩分别任司令。国民党5路“追剿”军和粤、桂军虽有25个师之众，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心怀异志，拥兵自保，各有打算。其中何键部行动比较积极；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二部虽然装备好，战斗力比较强，而不大听何键调遣。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守土自保，不愿为蒋介石卖力。湘南地区，共产党影响较大，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不强，又属无堡垒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实行反击，杀敌人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以打乱敌人的部署，适时创造战场和根据地。

但是，博古、李德对严重的敌情视若无睹，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拒不采纳上述建议，以致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命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险阻，从四面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冲出敌军的重围。中央红军奉命，日夜兼程向湘江急进。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2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次日，红一军团主力到达石塘圩；红三军团红4师先头部队渡过湘江进至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军委纵队已进到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如果轻装前进，可迅速抢渡湘江，减少损失。但部队仍带着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为了掩护全军渡江，同优势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11月29日起，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恶战。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部致电红1、红3军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这一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12月1日的战斗最为激烈、残酷。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枪炮声连成一片，硝烟滚滚，杀声盈野，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湘江。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人整连、整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经过整日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敌军的攻势，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但是，整个红军折损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5军红34师和红三军团红18团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进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在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敌人的包围之中，形势万分危急，指战员们心急如焚。

在继续西进渡江无望时，师长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部东返，准备沿原路转至湘南打游击。当部队进至青龙山附近，同敌一部遭遇，予敌以迎头痛击，打垮了该敌。第二天下午，部队又在新圩与追敌激战3个多小时，虽歼敌一

部，自己亦再度受到严重损失。这时，敌人重整部署，对红 34 师实行四面包围，妄图一举聚歼。在这危急情况下，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当红 34 师准备突围之际，广西敌人一部首先发起了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戮力同心，集中兵力和火力，勇猛反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由于不明红军底细，急忙向后撤退。这一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突围信心。但是，红 34 师毕竟是疲劳之师，孤军奋战，又处在敌人的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严重匮乏，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无人民群众支援，因此只有拼死突围这惟一的选择。就在这时，红 100 团团团长韩伟向师长建议：“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时机。”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意见。陈树湘当即决定：由韩伟指挥本团部队掩护，他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直属队及红 101、红 102 团余部共约四五百人，迅即向东突围。

为了掩护师部和兄弟部队突围，韩伟和该团 2 营营长侯德奎，将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编成三个连，由他两人直接指挥，并重新任命了连排干部。而后，他们向部队作了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红 34 师打不垮、拖不烂的光荣传统，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树立信心，争取胜利；要求每个人，特别是党团员和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掩护师部和兄弟团突围的任务。全体同志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决心拼死向前，誓同部队共存亡。

当深夜来临时，部队开始了突围。虽然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长期作战，十分疲劳，特别是近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没有喝上一口热水，饥肠辘辘，浑身冻得发抖，体力难支，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为艰难，但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同志们忘记了极度疲劳、饥饿和伤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携手并肩，一起行动。当部队刚通过猫儿园附近，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敌人突然像恶狼样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 100 团部队集中仅有的火力，猛烈反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刺刀拼断了，就用枪托砸。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全师胜利突围！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然而，部队越打越少，全团仅剩 30 余人了，并且同师部失去了联系。为了保存革命种子，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突出重围的陈树湘率领的师直和另两个团余部行至湖南江永县左子江时，又遭到敌人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国民党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红军一位师长，高兴得手舞足蹈，眉开眼笑，认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其主子邀功请赏。陈树湘不甘受辱，乘敌不备，用手伸进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 29 岁。陈树湘以自己的英雄壮举，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的头，把它悬在长沙小吴门的城楼上。其余 100 多名红军战士，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光荣献身。红 34 师广大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雄气概，在红军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段英勇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光荣篇章。陈树湘同志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更将永垂青史，流芳千古！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除了意志坚定团结奋斗的中国人以外，还有三名外国人、一名外籍人参加。一位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位是过去少有人知道的法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一位是越南人洪水。一位外籍人是朝鲜籍人毕士悌。

李德是德国慕尼黑人，本名叫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俄军队作战，在一次战斗中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担任过骑兵师参谋长。回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他被苏联情报机关派遣，先到中国东北，后又自动到达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改为中国名字。1933年9月李德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到达瑞金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中共临时中央在博古等把持下，依靠李德主管军事领导工作。

李德虽然有一定的战争经验，又经过正规军事学院的培养，应当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古今中外的战争不同，有许多特殊性，所以按一般的军事原则指挥作战是不行的。中国革命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同，十月革命是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中国则不同，南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毛泽东等被迫率领队伍上井冈山，依托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军事上则是“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因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苏军作战的原则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他到苏区以后，不深入调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特点和规律，照搬一般的军事原则和苏联红军的指导原则，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与之相配套的作战原则，命令弱小红军去和敌人打正规战，拚消耗，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撤销李德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及军事指挥权。这时李德仍然坚持跟随红军进行长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毛泽东的指挥才能表示钦佩，在危急时刻还保护过毛泽东同志。

长征中，因为他是外国人，在生活上仍然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匹骡子，一匹供他乘骑，一匹驮行李。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帮助训练骑兵，还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到达苏区后，曾访问过他。1939年夏季，我党中央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新疆返回苏联。

另一位参加长征的是法国人，传教士，名叫薄复礼，原名阿尔弗雷德·勃沙特。他住在贵州的一所教堂里。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领全军团突破贵州军阀的防御阵地，进到贵州黄平。为了解地理、道路、敌情和制定行动计划，急需贵州地图。中文版的难以找到，指战员们在教堂里找到一张约1平方米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这对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可说是无价之宝。由于是法文，指战员们还是不能有效地利用这张地图。经过打听，得知传教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既懂法文，又懂中文，于是红六军团司令部请他帮助翻译成中文。勃沙特一边口译，一边与肖克军团长交谈，他提供了不少情况，为红六

军团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他在红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了解了红军的政治主张，革命热情，官兵关系，尤其到达湘西以后，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方针和政策，打消了对红军的隔阂。他为这支队伍的正义行动所感动，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托人为红军购买药品，筹集经费。

红军的艰苦生活和频繁的战斗，使他难以坚持，他曾一度离开红军。指战员们都热情相送。但是由于红军活动多在贫瘠的大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敌情严重，土匪横行，离开以后反而觉得不如随红军行动有意义和安全，于是他离开不久，又回到红六军团。军团长和指战员们同样欢迎。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勃沙特又坚持与红军一起行动。在征途中，他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整整走了半年。

1936年，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红军首长考虑到战斗频繁、条件十分恶劣，决定送他离开部队。他依依惜别地离去。

他在红军虽然时间不长，但给他印象很深，回国后，曾写文章称赞中国工农红军坚韧不拔、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联系群众。这大概是外国人对中国红军最早的报道之一。

还有一位是越南人洪水。他原名武元博，1906年生于越南河内市。1924年他到达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5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杂志社社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回到越南，10月病逝于河内。

毕士梯，朝鲜平安北道人，生于1898年，后来侨居中国吉林珠河县。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九一八”事变后回满洲省委任军委书记，后到中央苏区工作，任军分区司令员、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指挥部队斩关夺隘，屡建战功，并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936年2月在长征中英勇牺牲。

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和人民群众苦战一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共中央和红军只好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被编在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军委纵队，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

军委纵队包括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及直属单位，分成两个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红章”。第一野战纵队为“红安”，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总指挥部。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总司令朱德，还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在这里，按照“三人团”原来的打算，准备把毛、张、王等人分散到各军团去的，后因毛泽东、张闻天有异议，才把他们留在总部。这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团”，为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在长征开始的时候，张闻天同毛泽东并肩同行，并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政治原因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张闻天就知道毛泽东的名字了，他们同为“少

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只是天南地北，未缘一面。

1931年春，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工作期间，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排斥和打击，张闻天在文章里、会议上也附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批评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他同毛泽东既未共过事，也无冲突，彼此更没有恶感。

1933年初，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后同毛泽东会面、相识。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与才干知之不多，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受命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多了，了解渐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同毛泽东作过几次长谈，虚心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请毛泽东参与和指导政府工作。他们俩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随即党中央迁往云石山，中央军委迁梅坑。毛泽东、张闻天都一起搬到云石山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居住。庙堂的一侧住着毛泽东与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住着张闻天。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关心、照顾，感情融洽。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打电话向张闻天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往救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再到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接连受到排斥和打击。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同博古产生了分歧，也受到了博古的排斥。共同的遭遇以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不满，是他们在政治上走到一起的基础。

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途程的时候，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王稼祥欣然赞同。那时，毛泽东疟疾未愈，身体虚弱，王稼祥受伤未好，弹片还在体内。他们二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一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这种特定的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畅谈，交换意见的良机。话题主要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上面。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谈及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分兵把口、拼命主义大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深入细致地剖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歼灭战等战法的错误。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使他们在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上逐渐一致。张闻天后来在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两个来月的突围行动，又一次证明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的糟糕透顶。在红军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博古愁眉不展，束手无策；李德常发脾气，迁怒于人；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思谋筹划，独立支撑。由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所有的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丧失了主动权。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先机，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感到，在这种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缄默不语了。

12月初，红军过了老山界以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在政治局

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之下又变成“全线抵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攻击；李德、博古还错误地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消灭敌人。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的争论，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军事指挥问题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最紧迫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红军进入西延山区之后，敌人判断红军将经绥宁、洪江、黔阳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蒋介石急令何健将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指挥约8个师的兵力，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8个多师的兵力，集中全力在湘西围歼中央红军，并令贵州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击红军西进。在敌人张网以待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不知应变，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硬是往敌人口袋里钻。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红军去湘西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2日，张闻天出席了在通道召开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毛泽东首先反对李德、博古向湘西进军的方针，坚持向贵州进军。张闻天、王稼祥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会后，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到湘西。他们否定多数人的意见，重又命令中央红军按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

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北渡乌江。李德对黎平会议决议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不甘心放弃错误的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感忧虑，意识到，如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损失就很难避免，必须改换领导。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休息。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话在刘伯承等几位将军中一传，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二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强渡乌江。会后，便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从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为在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进行积极不懈的斗争。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转兵任务，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动摇，使转兵改向不可逆转。这是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开展批评、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为它的顺利召开铺平了道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张闻天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堂圩里一郎中

1934年11月6日，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奉命星夜向九峰山奔驰。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暴雨，从天而降的水柱像鞭子一样，无情地抽打着广大指战员，连骡马都惊得惶惶不安，不肯向前迈步。古有“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此时是“大雨倾天马不前”了。骑马的指挥员干脆弃马而行，不顾一切地向九峰山前进。团长耿飏突然觉得一阵“激凌”，立刻意识到又要打摆子了。心里想着，嘴里不知不觉竟然说出声来：“现在不能来，现在不能来，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在大雨哗哗的雨声里，陈光师长却听到了耿飏说的话，用手遮在嘴上，大声对耿说：“要得！”

陈师长不知把耿飏的话听成什么了，当时风雨交加，战事紧迫，耿飏也未来得及问他，后来时过境迁，这句“要得”指的是什么也成了难解之谜了。

暴风雨给红军造成了困难，也给先于到达九峰山的敌人帮了倒忙。敌人立足未稳，又不便发扬火力，加上怕苦怕死，上山后还未找好阵地，就被红军赶跑了。

一夜风雨，一场激战，全团上下都成了“水兵”，有的同志还穿着单衣，背包都扔在麻圩坑了，被初冬的大雨一浇，浑身瑟瑟发抖。耿飏团长也感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嘴唇上还起了几个大水泡。这是疟原虫在作怪。

九峰山战后，气温骤降，很多同志受了风寒，部队病号日增。九峰山到处是森林，看不到一户人家。红军指战员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互相搀扶着行进。部队风餐露宿，忍饥受寒，终于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天堂圩。

在天堂圩，耿飏请一位老中医给指战员看病。这位当地有名的郎中，心慈性善，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他看到红军衣单体薄，有的病成那个样子还坚持行军打仗，目光中饱含着惊讶和敬佩之情。他不但为患重感冒的同志熬了一大锅理气驱寒的汤药，还为伤员敷上了接骨生肌败毒的药膏，对有风寒腿、腰背痛的人则施以针灸。部队从他那里买了一些中成药。他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感动。晚上让耿飏住到他家里，仔细为耿飏切脉配药，又亲熬汤药，让其服下。

耿飏问医生：“老人家，能不能把我的病一下子治好？”他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可我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出发上阵哪！”耿飏诚恳地说。

老人家拈着银髯，沉吟良久道：“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一服便见效。”

耿飏大喜过望，连声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人认真地说。“要得！要得！”耿飏“病急乱投医”，顾不得这许多了，便连声地说。

他仍然认真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可是断人香烟的罪过哟！”耿飏开怀大笑，拍着胸膛说：“不怕！不怕！只要能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谁知，第二天一早部队就奉命出发，向道县奔袭。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为耿飏配药，却把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飏。在这些民间医生看来，秘方比命还重要，甚至传男不传女，更不用说传给外人。现在他将秘方授予一个过路的只有一面之交的红军，足见其诚心实意，以及对红军的关怀爱护之情。

他将耿飏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君臣佐使作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你可仔细调理，仍可再生。”耿飏将药方小心翼翼揣入怀中，告诉他一定照办。

老中医又说：“大军所到之处，非深山即老林，每有瘴气、风霜，易染时症，可用‘七叶灵芝草’驱之。有病可治，无病可防。日啖一、二，无不灵验。”

所谓七叶灵芝草即大蒜。原来，大蒜这种植物，只长七片叶子，以后每长一片新叶，即谢掉一片旧叶，故有“七叶灵芝”的美称。大蒜味辛辣，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和杀菌的功效。老中医传授的这个民间验方，在长征中试用，果然灵验。

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飏才配齐了那付治疗疟疾的秘方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斑蝥，去掉头足，以桂圆肉赋型，一剂共为九丸，九丸分三付。耿飏只用了一付，严重的疟疾就基本消除。剩下的两付，在延安又先后治愈了两人。正如老中医所预料的那样，服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还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疟疾已不算什么顽症，有不少灵丹妙药可以对付它，那付按“以毒攻毒”原理配制的中药，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可在当时的“华佗无奈小虫何”的情况下，连奎宁都没有，人们只得听从“疟原虫”的摆布。由于此药毒性大，配制方法出奇，尊重老中医的意愿，耿飏一直未将此秘方和配制过程外传。

最可靠的人就是你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之后，陈毅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在从江西根据地突围的时候，党组织发给游击队一批金条，作为活动经费。为安全起见，陈毅把它包好，缠在自己腰里带着，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宿营休息，一直精心保管。

金子常缠在脖子上，自然会有些不方便的，时间久了难免会让人发现。因为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盖，到了夏天，腰部就凸出来了，有时有人在他的背后对他的腰部指指点点。这在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又是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颇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这一问题，陈毅不免有些担心，反复作过考虑：这是革命斗争的经费，分开背吧，如果遇到品质不好的人，等于是给

他发了一大笔路费；继续瞒下去吧，看来也瞒不住了。反正大家也都差不多知道了，干脆就给大家讲清楚。

一天，陈毅把机关人员和部队集合起来，把所带的金条、银元、钞票全部都拿出来，摆在了桌子上，然后朝大家大声地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花过这里的一分钱。发展党的组织和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了，所以有责任通知大家。”说到这里陈毅向大家环视了一下，接着又说：“万一我牺牲了，尸体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提议交给部队中最可靠的人背。”

同志们被陈毅这种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肝胆相照的高贵品德所感动。他的话音刚一落，大家马上回答：“党的经费应该让最可靠的人保管，最可靠的人就是你，还是你背！我们信得过你，你跟我们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党的经费还是你保管的好！”

陈毅的这一举动，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后来各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也都把经济向大家公开，成立并组织经济委员会进行保管，这对促进内部的进一步巩固和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和李德的一次交锋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由长征开始时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一种失败与埋怨的情绪笼罩着全军。惊魂未定的中央纵队领导来到山坡上的一座庙堂里，准备稍事休息。在这里毛泽东与李德公开进行了一次交锋。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共产党员。曾入莫斯科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和王明关系较密切。不久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由于东北生活艰苦，李德跑到上海，想留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又懂得军事，便请他当军事顾问。1933 年 9 月李德从上海到达瑞金，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此人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只知照搬教材和苏联红军的经验。由于他和博古的错误指挥，致使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继续遭受严重损失。中央苏区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后来的失败事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因而迫切要求改换领导，纠正错误的路线。毛泽东这位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创始人，曾多次受到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与迫害，在无权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几次正确的建议，都被无情地否定或置之不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无数革命者用心血及汗水及至生命创建的军队、苏区受损失，真是肝胆俱裂，怒不可遏。

李德刚刚从坐骑上下来，便对着警卫员怒吼道：“快！把 22 师师长周子昆捆来见我！”警卫员凝立不语。这时，庙堂里挤满了人，大家都以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位身材高大怒气冲冲的“洋顾问”。

博古坐在一个石墩上，低头皱眉，满脸沮丧。他听到李德的吼叫，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表态。显然，他还沉浸在湘江惨败的痛苦和迷惘之中。

毛泽东靠在庙墙上，听见李德的声音，放下了正要点燃的香烟，两眼瞪

着李德，注视着这幕剧情的发展，准备适时插手过问此事。

李德为什么要拿周子昆开刀呢？因为周所在的红 22 师是个新成立不久的部队，其基本成分是地方赤卫队和突击扩红来的农民，还未来得及进行正规训练，就仓促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战斗力较低。过湘江时该师被敌人的猛烈炮火和空袭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师长周子昆带了一些人杀出了重围。李德认为周子昆是临阵脱逃，要把湘江失败的责任推到像周子昆这样的中高级干部头上，并想杀一儆百，掩饰和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

这时，浑身血污的周子昆歪歪斜斜地走进了庙堂。李德见状极为不满，大声向警卫员喝道：“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捆起来？为什么让他自己大摇大摆走进来？”李德见警卫员不答话，不动手，又转向周子昆训斥：“你是个败军之将，你还有什么脸面逃回来？你的兵呢？你的部队呢？哼，送军事法庭审判，枪毙！”

周子昆抬起头来盯着李德，悲愤地申诉道：“死了很多人，我有责任，你怎么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李顾问，我总觉得你对红军的指挥有些失误的地方，应该……”

不待周子昆把话讲完，李德便暴跳如雷地说：“你还敢为自己辩护，鸣冤叫屈，你还敢批评我，枪毙！枪毙！”

博古不开腔，周恩来不在场，毛泽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拉着周子昆对一脸怒气的李德说：“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说着把周子昆拉出了庙门。

李德瞅着博古，希望他支持自己，制止毛泽东的行为。可是，博古仍然是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孤立无助的李德忿然走出庙门，他想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处置这个败军之将的。他出门走了几步，就碰上迎面走来的毛泽东。他十分惊诧地问道：“你把周子昆关在什么地方了？”

毛泽东不理睬他，只对翻译说：“告诉他，我把周师长放了，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叫‘立功赎罪’，不过周师长是没有罪的。罪在上面！”

毛泽东“庇护”周子昆，放走周子昆不说，还公然把失败的责任归到李德等人头上，这一下可触动了李德的逆鳞，气得这位洋顾问暴跳如雷，指着毛泽东说：“你这是在笼络人心，纵容败将！”

毛泽东哈哈大笑，从容不迫地说：“李德同志，笼络人心有什么不好，革命总是需要人多一些好嘛。千万不能搞孤家寡人！”

这是毛泽东与李德第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毛泽东在大庭广众中揭了李德的短，击中了他的要害，这使李德十分尴尬。李德似乎预感到自己“太上皇”的宝座动摇了，此刻最大的懊悔，是怪自己没有坚持劝说博古把毛泽东丢在中央苏区，现在对即将复出的毛泽东真是无可奈何了。

无私的援助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 25 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7 月中旬，红 25 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这时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了。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时任红 25 军副军长的徐海东说：“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都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三千人牺

牲了，也是光荣的。”会议决定红25军立即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徐海东和其他领导人即率部西进甘肃，其后又转战陕北。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等战斗的胜利。

后来，周恩来在谈到徐海东的贡献时曾说：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对于后来形势的发展意义是很大的。

在其他方面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对中央红军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刚与中央红军联络上后，他即向供给部的同志说：“我们来陕北比中央红军早，人地熟悉，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裤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随之，他指示供给部将全军团各种费用的全部资金一万元边币，统统送给了中央红军。为经过长途跋涉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雪中送了炭”。

不久，红十五军团又专门召开了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的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徐海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央红军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军政素质好，战斗作风硬，他们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剿共’阴谋，是一支英勇善战，举世无双的部队。我们一定要向中央红军学习，搞好团结，不要闹宗派、搞山头。我们早就盼望着中央红军的到来，现在来了，我们用什么作为见面礼，表表我们红十五军团的心意呢？”讲到这里，他朝全体同志扫了一眼，顿了一下，然后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坚定地说：“拿出实际行动来，尽最大努力，节衣缩食，从人员上、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

最后，徐海东宣布了在大大家充分讨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决定的支援中央红军的人员和物品：每个连队抽出机枪3挺、其它枪支若干、弹药若干箱；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和医药用品；在最近进行的劳山、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战士。同时，为保证质量，他还向全体干部提出了三个不送的要求，即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的药品、不送破脏的衣服。

过后，当中央红军各部队派来取枪支、物品的同志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油亮枪支、干净衣服和急需药品时，无不称赞红十五军团顾大局，风格高，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毛泽东和彭德怀还曾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三同志，对红十五军团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刘少奇在长征中

刘少奇长期做白区工作，先后在安源、上海、广州、香港、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两度被捕入狱。1932年冬，刘少奇告别妻子何宝珍，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进入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何宝珍带着儿子刘允留在上海工作，不久被捕入狱，1934年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妻子遇难，刘少奇深感悲痛，称赞其“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执行局委员长、劳动人民委员会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从事工运、查田、扩红等工作，为苏区建设和反“围剿”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兴国、宁都、

石城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征途。不久，按照周恩来、博古的命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红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八军团由新编红21、红22师合编组建，于9月21日在兴国成立，每师辖3个团，全军团约7000人。周昆为军团长，黄甦为政委。该军团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弱。11月中旬，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八、红九军团各改编为一个师，由刘少奇和红三军团选派的军政干部两人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何克全和红一军团选派的军政干部两人负责红九军团的改编工作。这项工作，由于行军紧张，没有如期完成。

12月13日，中革军委鉴于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受到敌人的前堵后追、重重封锁，损失严重，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人员编入红九军团。刘少奇随部到红五军团，后任中共中央代表。红五军团经过桂、黔边境时，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组织部队清理多余文件，予以销毁，减轻了部队的负担，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1935年1月15—17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并改换中央领导。刘少奇在会上态度明朗，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他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红37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在传达中他讲道：最近一年多来红军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恶果。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岗位上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接着，他同董振堂到各连队进行了视察。

不久，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3月，在贵州鸭溪召集红三军团以上政工干部座谈会，研究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在会上他就党的支部工作、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发言，使与会人员深受教育和启发。会后，他将红三军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电告党中央。

6月下旬，刘少奇出席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在发言中，支持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阐述了在川陕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优越性。随后，红军分路向松潘地区前进，于7月中旬到达该地区。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他动员红军女干部分编到各军团，以便男女同志互相照顾，安全通过草地。

9月，他出席在扎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同意毛泽东关于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红一方面军需要较长时间的整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具体融合两方面军的宝贵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他在一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部队参加的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两个方面军应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困难，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9月，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川康边。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即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商议，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3军驻地与周恩

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 1、红 3 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

9 月 12 日，刘少奇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及行动方针问题。他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拥护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0 月，刘少奇随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月同谢飞结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华北，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为开展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关键的一票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之前，王稼祥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博古、李德等实行教条主义给党中央、红军造成的被动局面，十分不满。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193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时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当时在会上提出改变进军路线的主张，认为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西进——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才有出路。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同志的大多数的赞同。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王稼祥参加了这次会议，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长征途中，王稼祥是坐担架行动的。其间，毛泽东因病也坐了一段时间的担架，正好同王稼祥同行，他们在宿营和休息时经常交谈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等一些重大问题。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并提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领导。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进而毛泽东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道理。王稼祥听后很受启发，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们共同感到应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此后，王稼祥作了大量的工作，找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取得这些同志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过湘江之后，红军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因脚伤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这样王稼祥有机会同聂荣臻在一起交换意见。王稼祥说，他参加的 2 次、3 次反“围剿”，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采取的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导的结果。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接着他又谈了对博古、李

德领导的看法，对他们的领导表示不满，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和支持。

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王明军事路线是错误的，由怀疑不满到要求结束错误路线的领导。同时，长征以来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加之王稼祥等人的努力和做工作，正是在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遵义城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上，气氛严肃庄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聂荣臻、李德等出席了会议。

首先，博古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对此，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博古的报告，分析和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

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接着张闻天也积极发言支持毛、王的正确主张。之后，周恩来、朱德等也都发了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统一了思想，最后做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做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活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专门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表兄弟同走长征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国民党军薛岳兵团8个师进到乌江南岸，黔军3个师向遵义、湄潭进击，川军10多个旅向川南集中，其中两个旅已到松坝以北。国民党大军云集，对中央红军形成了新的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月19日离开遵义。中央红军分3路从遵义、桐梓、松坝地区向川南开进，以便迅速北渡长江，到川西创建新的根据地。

杨勇任政委的红10团随红三军团作为左纵队，于25日抵达土城附近。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扼黔北大道要冲。此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已达土城以东地区。

中革军委为了清除进军中的障碍，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敌，集中主力围歼郭勋祺部先头4个团，以保障下一步顺利渡过长江。1月28日拂晓，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从南北两面向进至土城东北的郭勋祺旅发起进攻，激战竟日，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该敌。此时，敌人援兵已至，再战对红军不利。中革军委立即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战斗中，红军付出了一定代价。杨勇在率部进攻中，被流弹击中腮部。他在一渡赤水行动中，只好随着休养团行动。

1月29日凌晨，红军渡过了赤水河。在行军路上，杨勇不顾伤口疼痛，不时和其他休养员谈笑风生。突然，他听到有人以极细微的声音喊道：“世峻哥！你过来呀，世峻哥！”在红军知道杨勇的大有人在，但了解他原名叫世峻的却屈指可数。

听到这熟悉的乡音，杨勇翻身下马兴奋地说：“哪个喊我？”抬眼望去，发现路边有位红军战士。当他走近这位战士时，却十分惊奇：“怎么会是你呀？耀邦！”胡耀邦深情而又吃力地点点头。

杨勇赶忙把耀邦扶起，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病了？”胡耀邦点头不语。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不久，年刚18岁的胡耀邦被派到军委纵队中央工作团，任党总支书记，并负责中央工作团的青年工作。当时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不好，营养差，疟疾十分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在红军长征中，不少指战员身患此病，胡耀邦也未幸免。他连日发高烧，身体十分虚弱，以至行走困难，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行军。在此地休息时，他听到杨勇的说话声，他乡遇故知古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那亲切的乡音怎不使他激动不已。耀邦拉着杨勇的手说：“世峻哥，我怕坚持不到头哩。”

杨勇用双手搀扶着胡耀邦站了起来，并亲切地安慰道：“不会的，你要有信心。再说，有革命的大家庭，还有我在，同志们可以互相照顾嘛。”

杨勇和胡耀邦不但是从湖南浏阳河畔走出来投奔革命的同乡，而且还是同学和姨表兄弟。杨勇的母亲和胡耀邦的母亲是亲姐妹。因此，他们两人从小就相识而关系密切。1926年春，当11岁的耀邦头一次离开偏僻的山村，到40多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小学高小班读书时，遇到了先他而来就读的杨勇，从此他们朝夕相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感情和友谊日笃。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共青团秘密支部，一道投入10万农军攻打长沙的行列，一块趴在学校围墙上聆听毛泽东对秋收起义部队所作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又一同考入浏阳中学，杨勇十分佩服耀邦的颖悟聪慧和刻苦钻研精神。在浏阳中学，耀邦的国文和数学成绩在同班级中总是名列前茅。有一次，老师让他背诵一篇赋的序文，他竟一字不差、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他的作文常被批上“优”字，还曾当众朗读过。

胡耀邦个子虽小，但性格开朗活泼，思维敏捷出众，而且天不怕地不怕，常常在集会上发表讲演，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钟爱，很快成为学校里的知名人士。

1930年初，杨勇投笔从戎，参加了红军。刚升初二的胡耀邦也告别学生时代回到浏阳的时文乡，开始了革命生涯。时文乡是一小块红色区域，已建

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当时农村中有文化的年轻人很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看胡耀邦有文化而且思想进步，就让他负责儿童团工作。耀邦办事认真，很有组织能力，带领儿童团协助红军打仗，传递情报，书写标语口号。他还参与了乡政府的一些重要工作。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时，由于乡干部文化水平低，开始不太敢讲话，就让耀邦代劳。他善于演讲，讲起来总是有声有色，富有感染力，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当中共湘东特委选调干部时，崭露头角的胡耀邦被调到特委任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销后，成立湘赣省，胡耀邦仍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及至长征。

胡耀邦望着杨勇，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杨勇望着胡耀邦，感慨莫名，无法倾诉。他们谁也不曾料到，阔别多年的表兄弟、同学在这“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长征路上相逢，而且一个负了伤，一个患了疟疾。

杨勇毫不犹豫地帮耀邦扶上了自己的坐骑，牵着马随着滚动不息的钢铁洪流，缓缓向前走去，满天的彩霞把他们的身子映得通红。

两杨破乌江

湘江战役以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红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是夺取遵义，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红一军团受命强渡乌江，其2师由军委直接指挥，1师由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央纵队则在2师后跟进。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向北是重庆，向南是贵阳，东邻武陵山，西靠大娄山，是黔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古书中常说的“夜郎”属地。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向贵州，把贵州分成南北两部，也是遵义、桐梓南面的天然屏障。在遵义、桐梓之间的娄山关，有所谓“一开当关，万夫莫开”的威名。

欲下遵、桐，必先渡乌江，并过娄山关。

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第1、第2两师，分别在龙溪、江界、黄平一带准备渡江。

2师4团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攻占老黄平后，一面继续向乌江前进，一面侦察，同时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

这天夜晚，正是1934年12月31日的晚上，明天就要过元旦了，部队在乌江边上守岁。

这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迎新年，与昔日在苏区热闹的新年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共产党人、红军是革命乐观主义者，4团各连还是开了晚会。

晚会上，各连首长给大家贺新年后，接着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

晚会，成了乌江战斗的动员会。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完成军委交给我们先头团的战斗任务”，“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

天将破晓时分，耿飏团长专门叫人弄了一小锅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

吃罢早餐，耿飏和杨成武信步走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

到江边一看，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绝壁，仰首不见其顶。不一会儿，老天变了脸，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江中湍急的激流，激起的千堆白雪的浪花，与天上的大雪连成一片，分不清是雪是浪。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

耿飏和杨成武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大大小小的火舌一齐向南岸吐来。

原来，在江对岸的渡口的敌人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 500 米，据老乡介绍，有条极小的傍山小路，与对岸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那里是陡壁，江岸无沙滩。经过火力侦察，耿、杨发现，纵然如此，敌人在那里还是小心地配备了排哨。

这时，老乡还告诉耿、杨两人，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大庙，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一个团。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4 团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过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红军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

就在这时，4 团用 1 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 18 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泅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杨成武正要去 3 连，3 连长毛振华听到这个事后先找来了。他“毛遂自荐”，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还摆了很多理由。

毛振华，杨成武熟悉，也是他很喜欢的一名连长，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智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十分勇敢，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杨成武不大清楚。

他见杨成武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

这一日，冷风嗖嗖，阴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 9 点钟，佯攻部队先行进入工事，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一阵紧似一阵的打个不停。

就在这里与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在渡口上游 500 米的一个竹林里，正隐蔽着即将下水的 8 位勇士。他们是从 18 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杨成武对这 8 位勇士说道：

“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泅水过江！”

毛振华第一个站出来，说：

“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8 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飏团长发出命令。

8 位勇士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

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快过江的1/3了！”耿团长正对杨成武说着，话音未落，敌人的迫击炮弹打断了8位同志拉着的那条缆绳。

刹那间，江中的旋涡大显淫威。游到江中的战士只能折了回来。

第一次试渡失败了。在岸边杨成武他们接回了泅渡的勇士。但是，一检查，少了一名，原来这位同志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水中冻了两个小时，风大浪急，被江水冲走了。

他是强渡乌江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

第一次试渡虽然失败，但战士们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接受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

入夜，江水汨汨，寒风凛凛，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满天的乌云笼罩着大地。耿飏、杨成武在竹林里把担任偷渡的1营集合起来，作了战前动员。

突击赶扎的3个双层竹筏放在岸边。红军是不怕死的英雄汉。第一个竹筏又下水了。5个勇士在毛连长的带领下，首先跳上筏子，他们除配备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之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

第一筏顺利地离开了江岸。

敌人没有发现，第一筏继续向江心划去。

第二筏、第三筏相继下水了。

大家预祝他们成功，看着他们的竹筏离岸而去。一瞬间，竹筏即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大家站在江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黯黑的山影，期待着胜利信号的出现。

但是，10分钟过去了，始终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呢？直到30分钟后，才有一个通信员匆忙跑到江边报告，说：

“第二筏到了江心后，被水流冲下5里，险些翻掉，现在已经返回来了。”

耿飏团长与杨成武政委正在追问详情，第三只竹筏上的战士也返回了。原来他们的竹筏子也被水冲下了2里远，摸不到方向，几次险些冲翻。

至于那第一只竹筏，始终不知下落。

在此情况下，不能盲目地再发竹筏，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就在这时，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摸黑来了。他带来了重要情况。他说，追踪我军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军委催促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是越快越好。并派来了军委工兵营归4团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还一再地说，如果4团不能过江，全军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4团的指战员听到这一消息，个个情绪激昂，纷纷向团部请战。他们表示：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渡过江去，确保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江。

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尽管有两次失利也决不气馁，为了不失时机，立即出动60多个竹筏，强渡。

元月2日拂晓，天出奇的冷。而红军第一批三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却冒严寒，赤着膊，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

敌人开始没有发现红军，当竹筏距敌人约50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

清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有点纳闷。

竹筏离江心更近了，敌人更慌了，几乎乱了营。

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仔细一辨，啊，声音是从江对岸石崖边传来的。杨成武一阵紧张，赶忙举起望远镜，现在可以看清，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

敌人的火力突然一齐转向崖底。竹筏乘隙加速前进，筏头激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

竹筏靠岸了，岸边吹响起了洪亮、激昂的冲锋号声，在大江上空激荡、回响。

在红军凌厉攻势打击下，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纷纷向后逃窜。

现在完全可以判定，崖底下的人是自己的战士。

是谁呢？就是毛振华连长他们。

原来，毛连长与5个同志带了1挺机枪，乘坐第一个竹筏，在元旦晚上摸黑靠上了对岸。他们上岸后，希望后续部队过来，但是久等不见人来。不久，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在那里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划火柴发信号呢？在这困难情况下，他们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等待时机。

第一批强渡的战士与毛连长他们会合后，4团又赶紧调集1营的其他战士作为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这时2营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和军团炮兵一齐吼叫起来，向敌人压去。

1营过江了，神速地占领了高地。3营这时在江边焦急地等待过江工具——竹筏。忽然，对岸枪炮声异常猛烈地吼叫起来，不好，敌人的预备队开到了，齐向1营压来。他们夺取了1营占领的阵地，1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了江边。

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在团指挥所坐阵指挥的陈光师长派人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一同赶来。

赵章成可谓红军中炮兵的鼻祖了，炮打得十分准。只见他迅速地架起一门八二迫击炮。

站在旁边的杨成武对着赵章成说：

“赵连长，沉住气！”

“杨政委你放心！”赵章成说。

这个老炮手一手托起炮弹，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拉成弓步，没有瞄准镜，而是闭上一只眼吊了吊线，把炮弹送进了炮膛。

“轰！”一声巨响。

炮弹在敌群背后爆炸了。接着，“啵！”炮弹在敌群正中间爆炸了，顿时掀起一股浓烟。

硝烟稍散，只见那品字形的三个炸点的前后左右，躺下了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红军滩头部队，乘势发起猛烈的进攻。

现在，红军大部队乘胜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起来的浮桥，跟着3营冲过了乌江。

红一军团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

中央机关也踏着浮桥过来了。

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终于被红军突破了。

当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经烧掉浮桥，跃马在乌江上游百里以外了。他们只能望江兴叹，蜘蹰在江边追忆其妄图堵截红军的美梦。

就在耿飏、杨成武率红4团在猴场渡乌江的同时，杨得志、黎林率领的红1团也奉命从余庆赶到乌江另一渡口——回龙场，准备渡乌江。

为了加强火力，渡江前军团配给了1团几门“三七”小炮。可是1团的前卫营一踏进浅滩，敌人就开了火，不得不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与此同时，对敌人的火器和兵力配备情况进行火力侦察。

不一会，红军的“三七”小炮就对着敌人山顶的制高点开火了。

杨得志清楚地看到连轰几炮之后，敌人掉头就跑，纷纷钻到山后去了，敌人的战斗力确实不强。但杨得志的目的不是击溃他们，而是要渡过江去。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团长杨得志和团政委黎林一起来到附近的村庄，本来想看看能不能找点渡河器材，顺便再了解一下乌江的情况。结果一调查，发现敌人早就有准备，他们逃跑前对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村子里别说没有船，就连一支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难以找到。

船渡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也是不行的。泅水呢？湍急、汹涌的波涛将毫不费力地把人吞没。

“怎么办？”杨得志望着发愁的黎林，心里十分焦急。

风和浪还在呼呼地吼叫着，简直分不清哪是风声哪是浪响；雨雪仍然一股劲地下着，越下越大。风雨中，杨得志对着江岸的敌人，苦苦地思索着。

已经是下午了，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妥善的办法。杨得志正想拿望远镜看看对岸山顶上敌人的情况，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节很粗的竹竿，它漂在江心，随着风浪的冲击起伏着，旋转着。看着这一起一落的竹竿，杨得志兴奋地拉了拉身边的黎林，指着江面说：

“你看！”

黎林顺着杨得志指的方向一看，飞快地瞥了他一眼，说：

“扎竹排！”

战士们一齐动手，不一会儿便找来了许多干的，湿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竹竿。然后七手八脚地你捆我扎起来，没有麻绳用草绳，没有草绳剥竹皮，最后连绑腿带也解下来用上了。大约3个小时左右，便扎成了1个1丈多宽，2丈多长的竹排。这样一来，大家的情绪更高了。战士们纷纷争着报名，要划第一只竹排冲过乌江去。

傍晚时分，10几位战士在风雨中将竹排推到浅滩的水里。

对岸，敌人的阵地上一片漆黑，但稀疏的枪声一直不停。这时，红军的8名勇士跳上了竹排。黎林一再嘱咐他们，要沉着，到达对岸后，马上鸣枪两响，作为联络信号。

竹排同激浪搏斗着。岸上的人同竹排上的8位勇士一样紧张，每一个浪头，每一个颠簸，都冲击在大家的心头。

这时，只见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倒，迅速地冲向了下游。几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闪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

杨得志目不转睛地望着江面，望着那刚才还闪现出来的黑点。杨得志知道那就是8位勇士，多么希望再看到他们啊！可是，他们再也没有漂浮出水面。

岸上的喧嚷声一下子停下来了。江水的吼声代替了同志们对8勇士的呼唤。

风还在刮，雨雪还在下。黎林和杨得志并肩凝视着恶浪翻滚的江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此刻又能说些什么呢？两人痛苦地度过了几秒钟，但总觉得这时间很长，很长。

“一定要渡过去！”杨得志斩钉截铁地说道。他和黎林政委把继续渡江的任务交给了1营，战士们纷纷向营长请求任务。平静的江滩又开始活跃起来。孙营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大家，然后挑选了10几名战士。他们的装备和渡江工具与方才一样，不同的是渡江的起点换到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竹排上又增加了几个扶手。

渡江又开始了。10几位战士跳上了竹排。

大约过了半小时，前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杨得志感到肩上像压着千斤重担似的，内心十分焦急，如果这只竹排再出现问题，天亮了，一切都暴露在敌人的眼下，那……

“乒！”一声枪响，把杨得志从沉思中惊醒。抬头望去，只见火光从对岸山顶上飞出来。很明显，这是敌人放的冷枪，而不是大家盼望的联络信号。

“乒！乒！”

又是两枪。

黎林急步走到了杨得志的身边，但是没有讲话。

“乒！乒！”又是两枪！

“老杨，两枪，是山下响的！”黎林立刻惊叫起来，他很少这样激动过。

“啊！是我们的！”杨得志简直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是的，是我们的。开船！”

杨得志兴奋地一面继续望着对岸的山头，一面向孙营长下达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个竹排，如离弦之箭似地开动了。

几乎同时，我军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一齐开火。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破浪启程了！

不多久，只见对面山顶上红光闪闪，红光中夹杂着“通通”的音响，听声音杨得志知道那是手榴弹在敌堡中爆炸了。也就是说，我军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接着，又听到步枪、机枪吼叫起来，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了一片。

天险乌江终究也被红1团突破了。

彭雪枫激战夺雄关

1935年2月21日，中央红军先头第三军团突破二郎滩阵地，直向桐梓。而遵义是唯一的目标。大家心目中的敌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就跟在屁股后面捡红军破草鞋的周浑元。

“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

这两句口号每天挂在战士们的嘴上。

渡过赤水河，二郎滩战斗胜利之后，遵义更加接近了，战士们两条腿分外来得有劲儿。

沿途的民众，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屁股常常露着半边。男青年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迎接红军。部队里只要随便喊一声：

“当红军来哟！”青壮年就会跟着走。每一个团一天总要扩充百儿八十个新战士。

一天微雨途中，丛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半身披着破棉袄、下半身烂了裤子的汉子，拦住红 13 团团长沙雪枫的马头跪下，送上一张状纸，开头一句是“启禀红军大人”，内容是受某劣绅的欺压，逼其妻又索其女的新仇旧恨，请求红军申冤，状纸还没有看完，彭团长已泪流满面了。

可见，当地人民受反动派的压迫是何等深重。

红军驻在回龙场休息一天，干部会上，毛泽东做了报告。大会发出号召，把消灭周浑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的勇气提得更高。

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的还是娄山头。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是囊中物。所以娄山关便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头天下午，先遣营兵临桐梓城下，夜间兄弟部队赶到，拂晓占领桐梓。桐梓到娄山头 30 里。娄山关下山到板桥 40 里，板桥到遵义 80 里。

在红军占领了桐梓之后，抢夺娄山关这一光荣而严重的任务，便交给了红三军团第 13 团了。

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立即在连队中活动起来：

“同志们！为了重取遵义，必须占领娄山关！”

“不要忘了我们 13 团过去的光荣啊！”

“鸦片烟鬼王家烈，领教过了！”

大马路上红军浩浩荡荡，人声鼎沸，这是向着娄山关前进的进行曲。

忽然娄山关方向来了几个老百姓，大家立即询问：“娄山关有无白军？有多少呢？”

他们连声回答：

“有，有，有！娄山关的白军，往桐梓来了，板桥住满了，说是还有一个师长。你们来得好，你们来得好！”

立即，部队挨次传下去：

“快走！后面快走！一个跟一个！”

这是早已形成的习惯，将要接近敌人了，即使没有命令，大家自动地互相催促着，两条腿也自然而然地轻快起来了。

几千只眼睛，远远地望着娄山关上尖尖的山，朵朵的云，云裹着山，山戳破了云。

彭雪枫禁不住轻轻地哼起了毛泽东不久前才在马背上哼成的气势磅礴的三首十六字令：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离娄山关 10 里路的地方，远远地送来一声清脆的子弹声，接着又是一声，这说明是敌人来了。

预期的遭遇战斗，关键的是要夺取先机之利。在彭雪枫的指挥下，一向以敏捷迅速出名的第 3 营飞奔左翼的高山，不费多大事就抢占了敌人企图占

领的高点。红军战士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钻到敌人的两侧翼，光亮耀眼的刺刀，迅速地捅向敌人。

山脚下是 13 团的主力，在不顾一切地沿着马路跑步前进。冲锋号声，激励着战士们努力抢关。

途中由俘虏口里知道，敌人的主力昨夜赶到板桥宿营，2 个团伸出娄山关，其中的 1 个团又由娄山关向桐梓城前进，1 个团巩固了娄山关的阵地。此时，正是午后 3 点的时候。

从地形上说，对红军是不利的，娄山关给敌人抢到手了，并且有 1 个团固守着。每一个山头都成了敌人顽抗的阵地。为了夺关，我军就不得不“仰攻”了。

右翼的山，全是悬崖绝壁；中间的马路，敌火力封锁了；左翼的山，虽然无路，然而还可以爬。3 营于是先派 1 个坚强而又机动的连，由左翼迂回到娄山关之敌的侧右背。主力则夺取可以瞰制娄山关的点金山。

点金山之高、之尖、之陡、之大、之不易攀登，足以使敌人有恃而无恐。

这时上级又传来命令：限 13 团黄昏前后夺下娄山关！

这是命令，也是干部战士的意志！抢山，夺下点金山，彭雪枫将这一艰巨的任务给了第 1 营。

1 营的第 1 梯队进入冲锋出发地，第 2 梯队在不远的隐蔽地集结，火力队位于指挥所附近，对敌人猛烈射击。

冲锋信号发出了，战士们喊声如雷，向着敌人的阵地猛扑过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红军在烟尘蔽天、一片杀声中夺得了点金山。

登临点金山顶，可以四望群山，娄山关口也清楚地摆在眼前，敌人一堆一堆地在关的附近各要点加修工事。

娄山关，虽然不远，然而仍须翻过 2 个山头，而这 2 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敌人的机关枪连续地向着红军射击，这是敌人最后挣扎的地方了。

将近黄昏，细雨蒙蒙，冷风嗖嗖，红军攻占了点金山的英雄们未歇气就冲下去。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下，组织了向娄山关的冲锋，配备了火力。一阵猛烈射击，敌人后退了。但不等红军稳固地占领这一阵地，他们又呐喊着反攻了回来，阵地又被敌人所重占。红军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终究不能奏效。

大家看得清楚，有一敌军官，在后头督战，他的士兵退下了，又被他督上来。这家伙异常顽固，马鞭子赶，马刀砍，士兵们只得像被赶鸭子似地跑回来。

“兄弟们，打死压迫你们的官长啊！”

“白军士兵们，你们拼命，为的是哪个呢？看你们官长，再看看你们自己！”红军战士们冲锋之后利用休息的空隙，向着白军喊话，瓦解敌军。

“打死督战官，特等射手！”这里的红军指挥员命令。于是，部队集合了四五个特等射手，集中向着那位官长瞄准。一声“瞄准——放！”敌军官应声倒下了，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敌人好像竹竿之下的鸭子，屁滚尿流地滚下去了。

整个娄山关的敌人，因之动摇，自取捷径各自逃窜。

娄山关被占领了！娄山关是红军的了！

次日拂晓，大雾对面不见人。娄山关上传来密集的枪声。彭雪枫忙传令起床，刚要吃饭，娄山关警戒部队报告：敌人以密集部队沿大马路向我反攻。

饭后集合将毕，又是一个报告：敌人逼上了娄山关口，那里只有我军2个连。

彭雪枫决定还用昨日建立功绩的第3营，命令他们去增援：

“跑步！同志们！正是消灭敌人的机会！”

急重的脚步声，夹着战士们的喘气声。3营干部战士争先恐后地跑向娄山关，增援第1营。面前的枪声越密，他们腿跑得越快。

那是板桥来的敌人，企图重夺娄山关。以其最精锐的第4团，集团冲锋，火力之强，扑打之猛，使人难以相信那会是王家烈的部队。

第1营看到第3营赶来了，更加沉着应战。第3营指战员汗透了衣裳，居高临下投入了冲锋。在大雾弥漫中，红军枪刀并举，敌人所谓精锐的第4团，被杀得人仰马翻，不愿流血卖命的，只有向后跑。

第1营架了机关枪，对着敌人背后一阵扫射。似乎并不麻烦，敌人一齐倒地了。鲜血流入马路两旁的沟里，一滩一滩，殷红殷红的。

然而这并不足以警戒敌人的官长，又组织了第六次冲锋。

红军战士们向他们摆手：

“来哟，欢迎你们上来”

待敌人接近，一阵手榴弹便在敌群中开花了。震天动地的杀声中，敌尸堆高了，小河里的水变成了红流。

突然，从敌人阵地上跑过来3个士兵，背着枪举起双手，表示出投降的姿势。战士们热烈地欢迎他们。其中有个年轻的抢着首先说：

“我是6军团的司号员，经过清水江时有病掉了队，叫王家烈的兵捉住了，在连上补了名。前天从遵义开来打你们，我听了十分欢喜，今天带他们（手指其余两人）过来了。”

人们听他说是6军团的，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更加亲热起来，争着上前牵着手，问长问短，连打仗都忘记了。

当然，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就在同一个早晨，国民党军的3个团，由板桥出发，企图迂回侧击娄山关的左侧背，倘若奏效，娄山关必然不保。

正当娄山关正面红军第13团1营与敌人的第4团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左侧翼响起了枪声，听去约有10里远，浓雾未开，只听响声，不见队伍，看来是敌人增援部队上来了。正因如此，彭雪枫更加着急。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立即传令：以12团接替13团第1、3两营任务，配合左侧主力消灭板桥之敌。军团主力——13团、10团出左翼，迎击板桥来敌，11团从中央冲出去。

第10团、12团、11团昨天未赶到，早已摩拳擦掌了。隐约发现了敌人向山上爬来，战士们英勇地冲下去，黄昏以前到了板桥，俘虏们则恭恭敬敬地排在马路边的坪上。

稍作休息之后，战士们实行长途追击。

夜间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的河，前呼后拥，向遵义行进。虽然打了一天的仗，翻了一天的山，而且又要走夜路，可是并没有谁觉得疲劳，胜利的喜悦，挂在人们的脸上。马路两边的山谷里，回应着歌声、吼声、笑声。

这时，彭雪枫接到军团邓萍参谋长的电话：

“昨天娄山关被我击溃之敌是6、4、25、16团共4个团，残部连夜退回遵义。据说遵义城南有敌第1团及第3团。红军要跟踪追击，以占领遵义为目的。你们立即起床、吃饭、出发。11团为前锋，你们随后跟进。”

其实，这时红军没有一个人睡觉。

黑夜行军，众人肃静了些，天刚见光，又活跃起来。前卫 11 团，都恨没长翅膀，拼着两条腿，跑啊，追啊！张开大口，准备吞下敌人。

一座短山横断了马路，山上有敌人，而且还响着枪，11 团的首长估计是敌人的掩护队。干部战士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吞下去！走在后面的 2 个营还没展开，先头营就冲上去了，然而敌人并不打算走。

“你总会跑的吧！”彭雪枫说着，又集结 2 个营冲上去，然而敌人依然如故，而且轻重机枪更猛烈了。终于因为后续部队未赶到，敌人乘机反冲锋。跑在最前面的连队寡不敌众，又无地形利用，于是退下来了。落在后尾的 13 团张政委不得不边打边退，敌人是边打边进。

当先头连前进的时候，一个青年红军战士同他的哥哥并行着。半路上他哥哥被打死了，他仍然奋勇前进。现在退回时，张政委回头又看见那个青年战士跟在后头。

敌人紧紧追来，大喊：“小赤匪不要跑，捉住你！”敌人大概是想“生擒”吧！

这个青年战士从从容容地一边持着短马枪，一边闪一闪身回答说：

“你来呀，连屎蛋也别想捉到！”

说着，回头一枪，打倒了一个敌人。这时，红军大部队赶到，将敌人消灭了。

2 月 26 日下午，红三军团逼近遵义城外，部队进至老城北门对面的凤凰山、小龙山下，抢占了新城边村寨，控制了芙蓉江的跳蹬河至洗马河滩一线，与老城之敌隔河相峙，为了迅速拿下新城和老城，军团邓萍参谋长亲自带领团营主要干部，冒着敌人的枪弹跳跃前进，迫近城下跳蹬河滩，隐蔽在附近土墩的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的守城部署。

邓萍参谋长给各团、营干部传达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决心：要在当天晚上攻下遵义，以便第二天歼灭增援遵义的中央军。

当晚，军团主力向遵义新、老城发起了猛攻，一举歼灭了守城之敌。从娄山关到遵义城我军先后歼灭和打垮了王家烈 6 个团，终于在中央军未赶到之前，先敌占领了遵义新、老两城。然而，邓萍参谋长却不幸中弹牺牲。

2 月 27 日，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率 59、93 两个师，昼夜兼程从贵阳向遵义赶来。

红三军团以黄克诚为政委的 14 团和以彭雪枫为团长的 13 团，迅速占领了控制全城的制高点——老鸦山，以及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一线的山地要点，构筑防御阵地，红一军团的第 3 团和三军团的第 11 团奉命分别向滥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敌人。

三军团 12 团正在打扫战场，军团长彭德怀、军团政委杨尚昆又命令他们紧急集合，急速向遵义城南通向贵阳的公路口以西待命，准备向敌人侧背实行迂回进攻，配合正面防守部队，歼灭向老鸦山、红花岗一线进攻之敌。10 团坚守老鸦山，经受了敌人 1 个师以上兵力的多次疯狂冲击，短兵相接，拼死肉搏……有的阵地失而复得。

打得最危急的时候，老鸦山主峰一度被敌人占领。

军团首长根据军委指示，立即命令于部团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率领干部团配合 10 团，坚决进行反击，又一举夺回了主峰阵地。

当天下午 5 时，三军团下达了全面反击的命令。12 团和 11 团的迂回部

队逼近敌人侧后时，敌人一片混乱。不等他们稍加整顿，红军就发起了进攻。

在红军猛烈的火力和冲杀面前，骄狂一时的中央军被打得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因人生地不熟，这些家伙远不如王家烈的地方军跑得快、会躲藏，2个师的大部就那样在老鸦山脚下和半山坡上，被打得伤亡惨重，失去了作战的能力。

失魂落魄的敌人，漫山遍野到处乱窜。有的吓得发呆，找不到方向，不知往哪儿逃；有的蹶着屁股趴在地上打哆嗦；有的向红军作揖磕头求饶……俘虏实在太多，怎么抓也抓不完，连炊事员、事务长甚至伤员都动手抓。

红一军团主力在三军团攻占遵义城后，随即进至遵义至贵阳的公路两侧，沿公路由北向南发起了进攻。

吴奇伟眼看自己的性命不保，惶惶如丧家之犬，急令其残部向贵阳方向撤退。敌人抱头鼠窜逃到乌江边，正要渡江，红一军团随即赶到。吴奇伟已顾不得自己的部队，手忙脚乱，立即砍断浮桥的铁索。于是，桥被急流冲断，但见正走在桥上的慌忙逃跑的敌士兵一个个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掉在了河里。其 1000 多残部，除一部落水外，大部被俘，直至全部完蛋。

吴奇伟孤身带着几个随从，狼狈逃回贵阳，向蒋介石请罪去了。

遵义战斗，中央红军在 5 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 2 个师又 8 个团，毙伤敌 2400 余人，俘

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是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正确指挥的结果。

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红军获得了物资补充，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这次胜利证明，为了击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此时，毛泽东视察战场来到了娄山关，望着连绵不断的群山，诗兴大发，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徐向前改造“大烟鬼”

“大烟鬼”又称“瘾君子”，是指抽大烟走火入魔上了瘾的人。从 18 世纪末期起，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大量倾销鸦片，1838 年高达 4 万余箱，不仅毒害中国人，损害其身心健康，而且引起白银外流，通货膨胀，财政拮据。清朝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在广东虎门滩

当众销毁鸦片 230 余万斤。1840 年英国在美法两国支持下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禁烟运动功败垂成。百余年来，鸦片一直成为毒害中国人民的麻醉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消灭了吸食鸦片的祸患，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不料在新的形势下，这个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几十年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这是绝对不可掉以轻心，需要认真对付的。那么，重温一下徐向前改造“大烟鬼”的故事，是大有裨益的。

1932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 1.4 万余人在徐向前等率领下，到达四川北部通江地区。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西征，历时两个来月，转战 3000 余里，破敌围，翻秦岭，渡汉水，越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山三县，开始了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但是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红军利用蒋介石同川军间的矛盾和川军各派间的矛盾，依托川北山险，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烈火，迅速在川北大地燃烧起来。当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解放。他们唱道：

红军同志来远方，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巴山来了徐向前。

红四方面军的到来，震动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1933 年 2 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川军 6 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红军在徐向前等指挥下，采取“收紧阵地”和“决战防御”的方针，先以小部兵力，卡山险，制隘路，控狭谷，节节抗击，待敌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突然进行反攻，实施重点突破。经过 4 个月的作战，毙敌 1.4 万余人，俘近万人，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

红军作战的胜利，不仅使苏区迅速扩大，自身也很快发展到 4 万余人。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办教导队，办学校，开展大练兵运动。针时新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还发动了戒烟运动。

川北在四川属于贫穷落后地区，当时人称五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纸票多，五是抽鸦片的人多。特别是鸦片烟，为害甚烈，坑害了千家万户，祖孙数代。好多地方种植了罌粟花。鸦片充斥市场，吸食者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老年人吸，男人吸，而且年轻人、女人，甚至连娃娃也吸。富裕人家，桌上、炕上摆着镀金镶银的烟枪，不时有人在喷云吐雾；不少穷苦人的家里，一贫如洗，可也有烟灯或烟枪，一有机会就借吸烟过瘾。城市里和大集镇上，除了旅馆、饭馆，还有大烟馆。人们进大烟馆像进茶馆吃茶一样随便。川军像黔军滇军一样，素称“双枪兵”，每人都有一支打仗的枪，一支大烟枪。当兵的吸大烟，没有钱就强抢豪夺；老百姓吸大烟，没有钱只好靠偷偷摸摸，卖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卖老婆。染上大烟瘾的人，面黄肌瘦，形同骷髅，不抽烟走不动路，干不了活。烟瘾上来，如同大病临身，一把鼻涕，一把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红军扩兵，也招进了不少“大烟鬼”。打仗俘虏来的士兵，其中“大烟鬼”更多。广大干部战士对“大烟鬼”非常讨厌，主张凡属“烟鬼”，统统清除出去。

徐向前教育部属说：“老百姓当中，烟鬼也很多，怎么清除，都赶到白区去？闹革命，就是改造旧世界，旧世界是什么？重要的是人。改造旧世界，首先就得改造人。”

干部们说：“俘虏好改造，土匪也能改造，就是烟鬼难改造。他烟瘾上来，你给他讲好话，甚至给他磕头都没用，不如给他一口大烟！”

徐向前说：“戒烟是场艰苦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定要有耐心。现在地方政府正在发动戒烟运动，红军里首先要做好。我们要来个比赛，看哪个连队戒烟搞得好。往后，红军里一律不准叫烟鬼，他们也是同志哩！”

徐总指挥的话传达到部队，广大干部战士都觉得有道理。连“烟鬼”们听了，心里都热乎乎的，产生了自觉戒烟的念头。

红军不仅要会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又加上一条，还要会改造“烟鬼”。徐向前身体力行，每到一地一有空，他就找戒烟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批评帮助教育还没有彻底戒烟的人。

红军医务部门，根据徐向前的指示，制造了戒烟丸，发给抽大烟的人。政治机关还印发了戒烟歌片，戒烟教材。从大巴山下，到嘉陵江畔，到处可以听到《戒烟小调》：

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翻身呀，嗯嗯呀，不让我翻身呀！……

戒烟运动，在苏区和红军中深入持久的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烟鬼”们认清了抽大烟的危害，增强了革命意志，在戒烟纪律的约束和戒烟丸的帮助下，纷纷戒掉了过去不可须臾离开的毒品——大烟。这一运动，不仅繁荣了苏区，提高了苏区人民的健康水平，而且也解决了红军的兵源，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和红军改造“大烟鬼”，在中国近现代戒烟运动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王树声勇克剑门关

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突破嘉陵江川军防线，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严厉申斥，命其不遗余力加以堵防。

四川“剿匪”总部总司令刘湘，惊惶失措。他一面要求四川“剿匪”第1路军总指挥邓锡侯的第28军（以后改编为45军）主力，由绵阳、剑阁、昭化、广元沿川陕公路山区要隘，阻击红四方面军西进；一面准备以王缙绪接替刘邦俊充任四川“剿匪”第6路军总指挥，由第21军抽调10个旅归入该路战斗序列。把10个旅分为2个纵队。

3月31日，红88师抵达剑阁。剑阁城内所剩少数敌人已被红军侦察分队消灭。红军主力马上向剑门关疾进。

“剑门天下雄”的传言，四方面军早在从鄂豫皖进入川陕根据地时就听说过了。川陕根据地和剑门关只有一江之隔。登高西望，剑门关雄姿的轮廓，在茫茫云雾中时隐时现。

从关外由北往南，整架山的地势北高南低，72峰峰峦绵亘，极像72头雄狮面北而卧，日夜警惕地守护着四川大门。那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切斧砍一般，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只有一个隘口，悬在几丈深的绝壁中，古称“鸟道天险”。除此之外，即便是插翅也难飞过去。

关上有座三层门楼，楼上设置瞭望哨，底楼装置有两扇大铁门。在矛刀

剑戟时代，若有敌人闯关，守关兵关闭铁门，便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关口一破，就一泻千里，直下成都。因为它地形险要，又是战略要地，所以自秦惠王伐蜀以来，剑门关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关内由南往北，是起伏的丘陵地，这对于擅长攻坚的红军来说，倒是理想的用武之地。

邓锡侯见控制川陕公路阻止红军的打算已不能实现，乃令黄鳌旅守卫梓潼，李树华旅守卫魏城，杨晒轩旅守卫江油，龚渭清旅以一部守卫中坝，以另两个团及警卫团为预备队，随总指挥部驻绵阳策应；并令前方杨秀春师派总预备队、宪兵司令刁世杰部，死守剑门关隘阻击红军。

剑门关，成了国民党军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

4月2日拂晓，红88师抵达剑门关。

剑门关地势由南向北逐渐隆起，敌人坐西向东防御。

红88师发现东南山的地形很有利，于是便以红26团1个营正面佯攻，2个营到敌人右侧后，一个猛攻，打得敌人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敌1个营仅四五十人逃走。红军遂以1个团巩固阵地，2个团在后隐蔽待机。这时，31军也在右翼打响。

此时剑门场内，敌人集结了1个多团，正准备反扑。半小时后，敌人出动了，他们手持大刀，嗷嗷乱叫，在炮火的掩护下，猛攻红263团阵地。

红军以密集的火力迎击敌人，阵地前留下了敌人一堆堆的死尸。激战两小时，敌人再也攻不动了，呆在红军阵地前400米处对峙着，程世才看时机已到，先用2个连绕到北面堵住剑门关口，和熊厚发、郑维山亲自率268团、265团从左翼猛烈出击。

顿时，阵地前方打成一片火海。不到1个小时，反扑的敌人全部被歼。部队乘势攻入剑门场内，镇子里仅剩的少数敌人很快被红军消灭，大部敌人逃往关口，可关口已被红军封锁，敌人乱作一团，从镇内到关口近10里地的山谷里，仅被打死、打伤和摔死的敌人就近1000人。

方面军王树声副总指挥，按照原定的作战方案，指挥红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敌人。88师一部，从剑阁经汉阳铺和天生桥一带向西北急进，沿途横扫阻拦红军前进之敌，在剑门场以西，向守敌猛攻。

在王树声指挥下，红31军91师一部，在剑门场东神速切断广元、昭化和沙坝河等地敌军援兵，从东南面的黑山观、风垭子等猛攻。93师一部，从关口南面的五里坡到梯岩，直夺关口。

这时，剑门关外围敌人的据点全部扫清。敌人被逼上最后一个主峰阵地，红军把敌人团团围了起来。

临近11点钟，天空乌云由淡变浓，毛毛细雨越下越大，地上的水顺着山沟往下淌。

突然，山谷中出现了喊杀声。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

只见王树声副总指挥一边用望远镜看，一边说：

“棒老二还想反扑！”

他命令司号长说：

“告诉炮兵连长，给炮弹安上眼睛，往敌人集团工事里打！”

这时候，红93师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议论：

“部队经过长途奔袭，又苦战了一天一夜，是该使用预备队的时候了。”

“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该投入后备力量解决

战斗。”

作为王树声直接掌握的预备队 274 团 2 营营长陈五和估摸着这一下该上去干了，就给营政委递个眼色，一同向王副总指挥表态：

“请首长下命令吧，我们保证把主峰拿下来！”

王树声副总指挥没吱声。他仍然用望远镜在敌人的主峰阵地上搜索着什么。

陈五和深情地看了看熟悉的老首长，用恳切的声调说：

“是时候了，让我们攻击吧！”

“你们做好准备，听候我的命令。”

陈五和深知王树声副总指挥有他的用兵习惯和方法，他掌握的预备队，不用则已，要用就要解决问题。

王树声副总指挥放下望远镜，喊了声：“传令兵，快通知炮兵连，把炮弹往敌人集团工事里打。”又转脸对陈五和说：“陈五和同志，我命令你们 2 营向敌人主峰阵地发起冲锋！”

陈五和早就等得心急火燎似的，恨不得一步跨上主峰，几乎是在副总指挥下达命令的同时，就掏出了手枪，王副总指挥的话音刚落，他就喊了声：

“跟我来！”

5 连、6 连紧紧跟在陈五和的身后，冒着毛毛细雨，像猛虎扑食一般往前冲；4 连因为在第 1 次渡江时损失较大，所以改作营的预备队跟进。

敌人发现红军预备队加入了战斗，就集中所有的火力向 2 营射击，突然，陈五和觉得左背热辣辣的，用右手一摸，粘乎乎的一片血。

“营长，你负伤了！”卫生员跑过来为陈五和包扎。

“我没事，快去照顾其他同志。”正说话间，前面几个同志倒下了，接着，又是几个同志倒下了；2 营被压在一个土坎下抬不起头来。

这时陈五和才发现，由于为战友报仇，消灭敌人心切，一接到攻击命令，没有形成战斗队形，就带着部队往上冲，结果兵力火器展不开，有力用不上。

第一次攻击失败了。

陈五和照自己头上打了一巴掌，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责备自己是搞啥子的！

这时，王副总指挥已经把炮兵连长找来，正在下命令：

“敌人已集中在主峰阵地上，那是一个集团工事。”他用手指给炮兵连连长看，并说：“我命令你必须把炮弹打在敌人工事里，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 2 营再次发起冲锋。”

一发又一发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从红军头顶上呼啸而过，又准又狠地在敌人主峰上的集团工事里开了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

我军在炮火的掩护下沿着选择好的冲锋道路，直冲敌阵。只听漫山遍野军号齐鸣，战马长嘶，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犹如山倾海啸，震天动地。

2 营全营干部战士，以泰山压顶之势，端着复仇的刺刀，更勇猛地向敌人冲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战士们冲上阵地和敌人肉搏拼刺在一起，一个个敌人倒下去。

红军战士越战越猛，吓得敌人魂飞胆丧。由于红军占领了主峰阵地，守敌乱作一团。

这一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只见敌人横尸遍野，活着的抱头鼠窜，像乱了群的羊似的溃不成军。

国民党军团长杨倬云在部署兵力时，曾向守关人员下达命令：

“凡见溃兵就枪毙。”

当败兵逃回关上时，守关人以“临阵脱逃”论处，开枪射击，逼迫士兵回过头来和红军硬拼。

残敌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被压在一个不到300米的槽沟里，逼成挨打的缩头乌龟。2营居高临下，几百颗手榴弹一齐往下扔，槽子里人山人海，浓烟滚滚。像熬了一锅烂稀粥似的。

杨倬云见形势不妙，赶紧命令营长廖玉章抬出银元，每个士兵发给3元拼命奖。可是那廖营长没发几个人，就腰部中弹，由两个士兵扶持着，走了几步就倒地毙命了。

杨倬云见阵地已丢，营长中弹身死，就策马往关上逃。猛抬头一看，见关上已经红旗招展，吓得他不知所措。

他哪里晓得，就在2营血战槽子里残敌时，红88师1个连迅猛从西侧插入，夺了关口，堵死退路，他只好带着几名心腹随从逃往营盘嘴。但后面红军紧紧追赶，前面又是数十丈深的悬崖峭壁，使他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无可奈何地跳下了险崖一命呜呼了。

4月2日黄昏，剑门关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守敌4个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后来，剑阁人民为悼念攻打剑门关而牺牲的红军干部战士，在关口附近修了一座红军墓，剑阁人民政府在关口修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碑。徐向前特地为纪念碑题了“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的碑文，以传之后世，永志不忘。

在此期间，红9军于31日攻克阆中，歼敌一部。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阆中地区南下，于4月2日攻克南部县城，歼灭敌李炜如3个团。红4军主力向梓潼推进。

智胜“双枪兵”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九军团参加了长征的行列，在左后侧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1935年，自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四渡赤水，甩掉了敌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红九军团仍担任掩护全军西进的任务，奉命在乌江北岸单独作战，阻敌前进，然后寻机于滇东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昌与主力会合。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的两个多月里，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带领下转战千里，以积极的行动迷惑、引诱敌人，牵制敌人。他们受命后，调整部署，佯装红军主力并造成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假象，给敌人造成错觉。结果以2000多人的兵力牵制了敌人6个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西进的任务。

其间，他们在黔东北老木孔地区与军阀犹国才的“双枪兵”相遇，打了一个漂亮的出奇制胜的仗。3月底的一天，军委发来急电，说红军主力将要渡过乌江，发现敌军向我渡河站迫近，命九军团日夜兼程南下，于4月1日前赶到沙土镇渡口，尾随主力过江，由于当时雨大路滑，部队行军甚慢，待到达指定地点时，已晚了6个小时，结果前面的守桥部队已把浮桥拆除。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过江已不可能，黔军犹国才的部队尾追而来，敌情严

重，情况紧急，因为孤军作战，稍一迟疑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面对此种情况，军团领导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处境，决定发扬出奇兵、打硬仗的作风，立即离开江边，选择有利地形，设置阵地，吃掉一股敌人，以摆脱当面之困境。

参谋长郭天民根据军团首长的意图，立即带领部队部署战斗，他们在沙土镇上买了一匹红布，制做了100多面红旗，临时又抽调30多名司号员带上红旗，随一支小部队到沙土镇北面的鸡爪山上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军团主力则连夜开到老木孔地区，沿大道两侧竹林和灌木丛，埋伏起来，待机歼敌。果然，第二天上午，敌军沿鸡爪山北侧经过，发现山上红旗时隐时现，军号声此起彼伏，一时不知虚实，惧于红军声威，便匆匆绕道通过。正午时分，犹国才的“双枪兵”身揣鸦片烟枪，一队队地进入伏击圈内。只听一声枪响，九军团指战员从竹林中一跃而出，向敌猛烈开火，一举打烂了敌军的指挥部。敌人晕头转向，争相逃命。红军战士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乘胜追击。后敌人发现追兵不多，又几次进行反扑，九军团首长沉着指挥，从中午战至傍晚，打垮敌人3个团，生俘敌1800多人，缴枪1000多支。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范例。

后来，军委称赞这次战斗的胜利意义重大，认为九军团远离中央，独立作战，机动灵活，掩护红军主力，拖住并歼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当“月下老人”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中央红军正在云贵高原上艰苦跋涉。身材娇小而性格文静的刘英，穿着一身不大合体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正英姿飒爽地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中。忽然，通信员飞奔而来，递给她一个纸条，上写：“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下面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即军委纵队，也就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所在的队伍，是红军的核。刘英奉命迅速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对她交待说，中共中央的秘书长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将他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你刘英接替中央秘书长。

刘英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用神秘的口气问她：“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富春同志呀！”刘英不假思索地说：“点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开怀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洛甫！”

这样，刘英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脸上即刻泛起了红晕，毛泽东所说的“洛甫”，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闻天，这时，他已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前，刘英常常到中央队找张闻天，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俩之间的爱慕之意，于是乐于当“促进派”，索性把刘英调到中央队来工作。

毛泽东愿为刘英当“月下老人”，是因为他与张闻天有着不寻常的友谊。长征前，他们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已有共同认识；长征开始后，特别是经过遵义会议，他们已在政治上密切合作，同志间的友谊日笃。

刘英调到中央队后，跟张闻天一起行军，工作中的接触频繁，彼此间的了解日深，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有一天，毛泽东见到刘英，明知故问：“刘英，中央队有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了哪一个呀！”刘英微笑不语。毛泽东笑着说：“洛甫不错嘛！”刘英依然默默无言。毛泽东道：“你默许啦！”刘英咯咯笑了。毛泽东又问道：“你既然看中了洛甫，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刘英连忙声明：“我暂不准备结婚。”毛泽东说：“为什么？还要再考验一番？”

刘英这才说出原委：“一结婚，就会生孩子。我看许多女同志怀孕了，在长征中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暂时不想结婚。”

毛泽东一听，连连点头道：“小刘英，你很有头脑，等以后你决定和洛甫结婚时告诉我，我替你宣布！”

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刘英和张闻天决定喜结良缘。

毛泽东得知喜讯，非常高兴，要张闻天和刘英“请客”。毛泽东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风趣地说：“当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的洛甫，既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的这番话，逗得大家大笑不已。刘英忙说：“我可不是什么美人。”毛泽东所说的风流天子李三郎，便是唐明皇。

刘英同张闻天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革命的洪流把他们涌到了一起。刘英早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老师，在她的学校讲过课。不过，那时张闻天并未注意到刘英这个文弱的湖南小姑娘。后来，她在中央苏区遇见张闻天，说起当年在莫斯科曾是他的学生，彼此间觉得也很亲切。刘英去瑞金白云山看望过张闻天。不过，当时只是同志间的交往和友谊。

自从长征途中毛泽东把刘英调到中央队，跟张闻天朝夕相见，便开始对张闻天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毛泽东的“促进”下，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伴侣，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情真意笃，并肩携手，相爱了一生。

杨成武伪装“国军”取三城

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并且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中革军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红一军团的红4团走了好几天，占领嵩明后，摆出了一个进攻昆明的姿势。

半个月前，当红军佯攻贵阳，离贵阳城只十几里路时，云南军阀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忙忙派主力去贵阳增援。想不到，半个月后，红军进入大山绕了个圈子，又到了昆明城下。

龙云在紧急之中十分纳闷：难道红军个个是飞毛腿不成。滇军更是传得邪乎，说红军夹起锅盖能飞行。

蒋介石此时正在昆明，不由得手忙脚乱了。说来也巧，他在贵阳城郊，

红军就逼进贵阳，他到昆明红军又兵临城下。他一边“娘希匹、娘希匹”的用口头禅不着边际的骂着，一边催龙云快想办法。龙云眼看自己的巢穴危在旦夕，便又是电报，又是电话，还派出人去，四面告急。

然而，就在红军在昆明城附近将“活捉龙云”的口号呼得山响的同时，部队开始转移了，蒋介石和龙云又都上了当。

佯攻昆明，使云南全境震动。滇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这就造成了红军趁虚北进，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在敌人急如星火往昆明集中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向西北转移，直奔金沙江岸。

蒋介石虽然大骂毛泽东、朱德是赤匪，但内心深处又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用兵韬略的高明，常常自言自语：“这个毛泽东，用兵简直是神了。”

红4团单独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的任务后，直奔昆明以北金沙江畔。

4团到金沙江畔，要经过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那里敌人的正规部队不多，但杂牌部队、民团武装、伪警察还是不少，一旦交手，拖延时间，会影响大部队行动。

政委杨成武与新任团长王开湘在一起商议。

“只能智取，不宜硬攻！”杨成武向王开湘建议。

“老杨，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们有现成的保护色。”王开湘兴奋地说。

原来王开湘说的“保护色”，是指前不久我军回师遵义时所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服，和配上套的一些武器。若是用它来化装，真可谓万无一失了。

他们当即命令2个营各拿出1个连和团侦察连一起进行化装，尤其对侦察连，要求不但形似，还要神似。他们把侦察连长王友才叫到团部，面授机宜。

王友才是个小个子，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却不小，两眼炯炯有神，办事干脆利索，上山侦察他能，下水架桥他行，打仗冲在前面，要他们连修路筑道，他坚决执行命令。他识字不多，革命道理讲不出多少，但干起革命工作来毫不含糊，人们称赞他是神出鬼没的实干家。

现在要他扮演国民党连长这个角色，虽然他未试过，但凭他那机灵、聪明劲儿，一定会成功的。

于是，杨成武随侦察连走在头里，向禄劝赶去。

杨成武他们快进城门时，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家伙就跑过来，疑惑不定地问：

“你们是哪里的队伍？”

原来，这些蠢家伙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而他们的上司宣传，红军是一支衣冠不整，手持土枪、梭标，青面獠牙的土队伍，只有“中央军”才着装整齐，武器精良。现在城门口突然出现一队整齐的队伍，扛着一色的捷克枪，他们认为肯定是“中央军”了。但是，由于上司没有交代过要来这么多人，他们又不免有些纳闷。

这时，王友才一个箭步冲到那伙民团前面，用责问的口吻，声色俱厉地反问：

“怎么，你们的上司没有交代？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在城门口拦阻我们‘中央军’，放肆！”

一听说“中央军”，像“鬼”见了“神”，民团老爷们看到那闪亮的钢盔和闪亮的外国造枪，揣摩着这支队伍一定来头不小。于是，那几个人中站

在前面的（看来是他们的头头），双脚“啪”的一声，来了个立正，后面3个也连忙歪歪扭扭挺起了胸。

“请问长官官阶？”那领头的战战兢兢地问。

王友才一听火了，伸过手去就是一个巴掌，厉声吼道：

“你眼睛瞎了，老子是上尉连长，我们团长还在那里等呢，还不快去通报！”

那家伙挨了一耳光，毫不反抗，反而强装笑脸，说：

“小人该死，小人无知，我马上进去通报。”

王友才听说他要去通报，转念一想，说：

“不用了，你就带我们进去！”

就这样，这4个蠢猪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引着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到了县政府。

一会儿，禄劝县的县长、警察局长、民团团长、商会会长，以及县城里大大小小的绅士、地主都来了，有的带着太太，集在县府大厅里。

“中央军”首次光临禄劝，而且来了位“团长”非同小可，伪县长立即下令悬挂国旗，而且办了丰盛的午餐，好烟好酒摆得满满的。杨成武悄悄地交待王友才，为赶路，放开肚皮吃饱，但酒只能少量喝，以免耽误任务。自然，其他部队也美美地吃了一顿。

县府大厅的宴会上假戏真做，谈笑风生，上了三道菜，杨成武就问旁边的胖县长：

“龙街的情况怎么样，你们知道不？”

“离这里太远了，搞不清楚！”

那胖县长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

“武定县的情况知道不？”杨成武又问。

“我更不清楚！”胖县长说。

“老百姓交了钱，养了你们，你们这样玩忽职守！”杨成武打起官腔训斥他。

大厅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绅士们摸不着底细，一个个面面相觑。

王友才趁机向伪县长说：

“还不赶紧与武定县通个电话问问！”

“是！是！”县长连连点头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擦去额上的汗水。

一会儿，电话通了，对方接话的是武定县的县长。

杨成武估计，王团长带的那一路，这时该到武定了，便怒气冲冲地说道：

“都是饭桶，耽误军机，谁负责任？告诉武定县，我们的部队马上去！”

胖县长如释重负，连忙应是，跑到电话机房，用大声向对方嚷道：

“武定县长吗？‘中央军’马上去武定，请开门迎接！”

杨成武起身离座，大大小小的绅士列队相送，丰盛的宴席就这样进行了一半而中止了。

由于禄劝县长的那个电话，后来杨成武听王团长说，武定县欢迎“中央军”的场面更加隆重，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像武定县一样，由于事先打了招呼，当杨成武带着部队到达元谋时，元谋县大小官员和民团已经集合好，连夜迎接。

杨成武当即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这时，那些县长老爷知道上了当，碰上的是真正的红军，不是中央军，

但是，已经晚了，只好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

4团由于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3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

第二天清晨，4团奉命赶到皎平渡。按预定计划，4团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任务。

肖应棠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3日中午，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部屋子里坐满了人，除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外，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叶子味，看样子正在开会。

见5连连长肖应棠进去，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

“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决定我团担负抢夺渡口的任务，我团也决定以2营为先遣支队，并以5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占皎平渡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

他说完了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的同志说：

“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部队在动员、轻装和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后，便沿着直往金沙江边最近的小路迅速出发了。肖应棠和副营长霍海元走在前卫排后面，指导员和工作组走在部队的最后。

学员们自从在遵义、土城打了两个漂亮仗以后，士气高涨了许多；经过两天休整，恢复了体力，这次又担任了渡江先遣支队的后卫连，更是兴高采烈，一路上快步疾走，劲头十足。虽然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道路，太阳又晒得汗水直流，但是每小时仍行进10多里。

队伍翻过了一座大山，离金沙江只有60来里路的时候，休息了一下。

太阳下山，天色朦胧的时分，5连快要抵达江边。

远远看去，乌黑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前面，分不清哪儿是树，哪儿是石头。山影子前面，金沙江像一匹摊开的灰布宽宽地铺在那里，看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山、江连接在一起。远处已经现出了点点闪烁的灯光，像敌人的眼睛在窥视着红军，令人讨厌。

快到江边了，肖应棠向后传出口令：“金沙江到了，作好战斗准备！”

黑暗中，前卫排1排长忽然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向肖应棠报告了情况。

原来敌人已经知道我红军进入云南，恐怕我军抢渡金沙江，连日来，陆续调遣了军队驻守在金沙江岸的几百里防线上，不仅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所有的船都掳过河去，断绝了江岸的交通。这个渡口的敌人，还不断派出便衣侦探过河探查情况。今天，这些个探子们不知道是躲在哪里去抽大烟了呢，还是到哪里去敲诈老百姓去了，但他们过江的船一直等在江边。

当前卫侦察组走到江边时，有个船夫以为是自已人回来了，懒洋洋地问道：

“回来了吗？”

学员们随机应变地说：“回来了！”紧跟着几个箭步窜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的胸膛，于是，船和船夫被红军俘获了。

听完了1排长报告，肖应棠迅速赶到江边，首先安慰了一下吓得发抖的船夫，然后向他们了解河对岸的情况。船夫们结巴了半天，互相又补充了一番，才把情况搞清：

对岸镇子不大，原来有1个管收税的厘金局，有保安队员三四十名，今天早上又来了正规军1个连，住在镇子右边，镇子中央临江处有一个码头，码头上经常有1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为情况紧张，又添了1名。敌人虽然怕红军过江，但是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也不会来得这么快，所以防守也不太严密。

肖应棠和副营长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过江。指导员动员了一下船夫，并答应多给他们大洋和鸦片烟。

这些人平常也受敌人的气，现在见有好处，便满口答应说：“随长官吩咐！”

肖应棠命令1排2排随他首先过江，副营长和指导员、工作组都留在江这边。3排在江这边警戒，如过江船只遇到情况，随时以火力支援。

船靠岸了，肖应棠轻轻推了推身边两个预先派好的学员，他们便端着枪跨上岸去，迅速地顺着石阶往上走。只听见一个云南口音的哑嗓子问道：

“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

2个学员也没有答话。接着便听到一声低沉而严厉的喊声：

“不准动！”

听见这一声喊，肖应棠便带领学员跑步上去，敌人的2个哨兵莫名其妙地被俘虏了。

肖应棠问了俘虏的口供，说的情况和船夫说的一样，便命令1排上街往右打正规军，2排往左打保安队，发展情况随时报告。

渡船，又回去接后续部队了。

按照原计划，肖应棠让人收集了一些茅草在江边上烧起来，这是报告已经渡江的信号。

火很快地着了起来，照得江面上泛起了抖动的红光。信号已经发出，各排的行动要一切顺利才好呀。肖应棠正在发急，1、2排的通信员都跑来了。

情况是这样的：1排到达敌人连部门口时，哨兵喊道：

“谁？”

这时候，已经被教好的俘虏答道：

“自己人！保安队的。”

敌人再要问什么时，一下子就被前卫班冲上去抓住了。问了一下情况以后，全排进入院子，分头向几处房子跑去，踢开房门大喊：

“缴枪不杀！”

谁知门一踢开，满屋子烟雾腾腾，香气扑鼻，原来敌人都躺在地下对着小烟灯吸大烟呢。听见这一声喊，这些“双枪英雄”开头是昂起脑袋直发愣，接着是慢慢地举起双手，惶惑地说：

“我们今天才到，莫误会了吧！”

1排的学员说：

“放心吧！误会不了，我们是红军，正是找你们来的！”

于是这群“英雄”才无可奈何地互相望望，在闪亮的刺刀前面走到院子里去集合。

2排的经过大致和1排相同，他们是冒充纳税人混进去的。那些抽鸦片

烟、打麻将的保安队员，像鸡一样被捉个精光，连队长都没有走脱。

好！一切顺利。肖应棠兴奋地把驳壳枪往套子里一装，命令通信员在岸上再烧起一堆火，发出了第二个信号。

正在这时，副营长过来了，说：

“团长命令你们沿着通往会理的山道前进 15 里警戒。”

队伍迅速在街上集合起来。一走出镇子，便是一条向左伸往山沟的小路，顺着这条石头路走了十六七里地，前面有个较平坦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宿营。学员们分班捡柴、打水，派出少数人烧火做饭以后，便都休息了。

一会儿，一堆堆的火着了起来，学员们抱着大枪横七竖八地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肖应棠被一只手猛烈地摇醒。睁眼一看，原来是副营长又上来了。

他匆匆忙忙地说：

“肖连长，快起来继续前进！”

肖应棠心里一惊，马上坐起来问道：

“有情况了吗？”

副营长用手一指远处高山的影子说：

“顺着这条路上去 40 里便到山顶，如果敌人占领了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对我们威胁极大。团长命令我们在拂晓前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更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纵深，巩固渡口。”副营长接着笑笑说：“现在是主力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要从这一带过来。”

肖应棠问道：

“什么？一、三军团都从这里过？”

副营长连连点头说：

“对了！对了！”

啊！肖应棠一切都明白了，出发之前首长们匆匆忙忙地开会，周副主席焦虑不安，并了解他们连的情况，原来不只是考虑中央纵队，而是全军的行动呀。

下午三四点钟，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来了。首长们显得很高兴，见面就说：“你们真能干呀！”

没有几分钟，团长召集 5 连和 4 连、重机枪连的干部布置任务了。他命令 5 连在右边这个山头发起攻击，负责打大路右侧的敌人；4 连从左侧山头发起攻击，打大路左侧的敌人；重机枪连 4 挺机枪分别在两个山头掩护冲锋；打垮敌人以后，乘胜追击，没有命令，不准停止。

在团长统一指挥下，重机枪开始射击了，冲锋号响了，各连往前冲去。敌人被打垮下去了，那些丧魂落魄的敌兵慌慌张张地跑得漫山遍野都是。

红军一气追下去二三十里，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跑不动了就伏在地上装死，还有的跑急了从陡坡上掉下去摔死了。

5 连正追到一个村子的后山时，接到骑兵通信员送来团长的命令：

“停止追击，就地宿营警戒。”

一、三军团陆续渡过了金沙江。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畔，耸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刚

劲雄浑的“十七勇士纪念碑”七个大字。碑下半部雕着17勇士在枪林弹雨中乘风破浪、飞舟挺进、直逼对岸的浮雕像。前来游览观光和瞻仰纪念碑的人们，看见浮雕，仿佛看到当年17勇士在大渡河中勇敢无畏的英雄壮举，增添了对勇士们的无限崇敬。

那是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革军委组织了北上先遣队，刘伯承、聂荣臻率队为全军开路。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先遣队红1师第1团冒着大雨昼夜兼程，向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急进。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群山耸立，河岸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素有“天险”之称。安顺场渡口河宽约100米，水深流急，两岸山势陡峻，川军在红军到达前派第5旅第7团1个营抢占了南岸有利地形，在河对岸构筑工事，凭险固守。在此渡河，天堑加敌军阻击，困难可想而知。

敌人在红军到达前，抢走了当地老百姓所有的船只，在安顺场渡口对岸下游驻有1个团，上游泸定城驻3个团，1个团在河对岸构筑工事，凭险固守。蒋介石判定红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急忙调集兵力追堵红军，加强大渡河防御力量，国民党军从飞机上撒下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刘伯承骑在一匹大白马上，眼望天险大渡河，直泻而下的激流，部队泅渡是不可能的，要想渡河，必须要有船，他命令杨得志迅速抢占渡口。

雨夜，伸手不见五指，黎林政委率领一个营在下游佯攻，吸引敌人主力，杨得志带领一个营向渡口发起攻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渡口守敌，缴获了仅有的一条船。

这条船，成了红军大军过江的唯一希望。天渐渐亮了，雨停了，红军四处寻找，找来了十几名船工。一条船装不了多少人，指挥部决定组织一支精干的渡河奋勇队。

杨得志决定把任务交给1营营长孙继先。

英雄的战士们听说要组织奋勇队渡河，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争着抢着要第一个过河。

“怎么办？”孙继先看着奋勇报名的战士，既高兴又着急。杨得志和孙继先简单地商量一下，决定集中在一个单位挑选。

1营2连集合了，营长一个个宣布被挑选上战士的名字：“连长熊上林，2排长罗会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16个名字叫完了，16名勇士跨出队伍，他们都是2连优秀的骨干，个个精神抖擞。

突然，队列里“哇”的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边哭边嚷：“我也去！我一定要去！”他是1连的通信员陈万清，杨团长和孙营长被这位战士所感动，互相对视了一下眼色，孙营长说：“去吧”，通信员立刻破涕为笑，飞快地加入了16人行列里。

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熊上林队长率领，准备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在咆哮，但在勇士们面前，浪再高也在脚下，流再急，也要被征服，敌人再凶恶，也无所畏惧。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林带领17名勇士跳上渡船。杨得志大声喊道：“同

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船启动了，一叶飞舟，在激流中，像离弦的箭，向河心驶去。

对岸的敌人见驶来船只，一起向小船射击。“打！”杨得志一声令下，负责掩护过河的炮兵将炮口瞄准敌人的工事，发射出仇恨的炮弹，敌人的碉堡在爆炸声中飞上了天，红军的机枪、步枪，像暴风骤雨一样袭向对岸敌人。船上的老船工奋力向对岸划着船，渡船被汹涌的浪涛击打着，激流冲着船斜向对岸，敌人的子弹，在船四周不住地溅起水花。忽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小船被掀起的浪冲击得摇晃起来，船工使出浑身力气，支撑着船，好险！对岸的人的心跟着船紧张……敌人的火力更密集了，小船在炮弹掀起的水柱中穿行，冲破一个个巨浪，艰难地向前划着。又一阵激烈的弹雨，船上的一名战士连忙捂住自己的手臂——杨得志情不自禁地说，“他负伤了！”正在这时，小船船头向下游一转，船顺势向下方一块巨石滑去，船边喷起白浪，船头继续向下滑，巨石下游是巨大的漩涡，一旦顶不住，船进入漩涡，非翻不可。岸上指挥员的心提到了嗓子。一面命令部队猛烈向敌人射击，一面随着战士们们的声音，大声喊：“撑啊！”“加油！”他们在为勇士们鼓劲。

就在这危急时刻，船上的4名船工跳进激流中，稳稳地站住，用背顶住船，另4名船工奋力撑船，经过一阵搏斗，渡船又前进了。

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20米，15米，10米，没等船停靠岸，勇士们迅速站立起来，有的已跳下船去。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企图将勇士消灭在渡口。红军指挥所一声令下，机枪、炮弹一齐打向敌人，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四散奔逃。17勇士在火力掩护下飞向岸去，一排排手榴弹、一阵阵冲锋枪扫射，把敌人打垮了。

敌人趁勇士立足未稳，发起反冲击，17勇士在南岸机枪、炮兵掩护下，杀向敌阵。勇士们一手持枪、一手举刀，在敌群中左拼右杀，大刀寒光闪闪，勇士杀声震天，个个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川军哪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对手，一个个只怪老娘少给他生了两条腿，哭爹喊娘仓皇奔命，17勇士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在17勇士掩护下，红军一船顺利渡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在大渡河消灭红军的美梦。

长征途中的陈赓

陈赓同志不仅是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位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他十四五岁当兵，19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20岁刚过便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30年代初他担任红12师师长。后因负重伤去上海治疗，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酷刑而坚贞不屈。

长征中，陈赓同志一直随中央纵队，任干部团团长。他中等个，那时很清瘦，戴着眼镜，走路虽有点跛，但大将风度不减。他对革命事业忠诚、坚定，对部队要求严格、关怀、体贴。对上对下都异常豁达坦率、豪爽开朗。生活上可以说不拘小节。就餐时， he 可以和战士抢肉吃，休息时，可以夺警卫员或者老乡的烟袋，作“吐烟圈”的游戏；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夫人们开那种别人开不出来的玩笑；也可以在毛主席作报告时，跑到台上去喝毛主席缸子里的水。指战员们喜爱他、信任他、尊敬他。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自己的亲人。而这时的陈赓还不满33岁呢……。

红军在四渡赤水后，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连夜向金沙江急进：红一军团抢龙街渡，红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皎平渡，红三军团殿后掩护。

陈赓指挥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 1 排守军，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 7 只小船。不要小看这 7 只小船，红军就是凭借这 7 只小船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掉。为了保障渡口的安全，陈赓指挥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袭扰不便渡江；因此，红一、红三军团都集中到皎平渡渡江，而以红五军团一个师担任掩护。

3 天后，敌人的敢死队第 13 师几个团的兵力，向皎平渡追来，被红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敌第 13 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红军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红军就依靠皎平渡 7 只小船，经过 9 天 9 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敌人只在渡口边拣到红军一只草鞋。

刘伯承与小时丹歃血结盟

在四川西部大凉山彝族地区，传诵着一个汉彝结盟的故事——这就是刘伯承元帅率领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区时，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使红军顺利通过该区的故事。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向大渡河急进。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拖乌到安顺场，这条路是在崇山峻岭的悬崖陡壁上开出来的崎岖小路，十分难行，特别是走这条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蒋介石料红军不敢走第二条路，认为红军不会在国民党军“追剿”下，又去闯彝区，遭彝人打击。必走从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为此，在富林作重点防守，企图阻止红军渡河。鉴于此情况，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对政委聂荣臻说：“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是不是建议军委改变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白彝和黑彝，他们内部有矛盾，但主要矛盾又是彝汉之间的矛盾。汉人不尊重他们，叫人家黑骨头，白骨头，他们都恨汉人，如改变路线，必得经过这个麻烦的彝民区。”

聂荣臻答道：“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 5 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刘聂两个四川老乡胆魄过人，要闯彝族区。这个彝族区传说就是《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族人性情强悍，善骑射，会打枪。部落之间常发生械斗。特别是汉人常对他们欺压，积怨很深，对汉人抱有极大的成见。要过彝族区，并非易事。

中央军委收到刘聂电报，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红军又选择了一条奇险无比的进军道路。

出发前，刘伯承站在队前，作了动员，交代党的民族政策：“彝族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先遣队调查了彝族风俗习惯，对部队进行教育，又请了一位通司（翻译）。一切安排妥当之后，5月22日，开始进入彝民区。一路上只见山峰云雾缭绕，道路蜿蜒崎岖，山谷中林木葱茏，野草丛生。部队一会爬崖，一会过涧。山涧间往往只有一条独木桥，走起来十分危险。山中细雨霏霏，使人感觉瘴疠弥漫，心生恐惧。快接近彝族区了，只见山上山下，彝族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草莽之中，围向红军，企图阻止红军前进。从这阵势可以看出，如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这时，后面又传来一个使局面更紧张的消息：跟在主力后面的工兵连，因为没有武器，刚掉到主力后面100多米远，就被彝民把他们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搜而光，被抓去的人，被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看来，他们不伤害红军。

先遣队只好停止前进，肖华、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和国民党官兵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留宿。

可是，彝民仍然摆手挥刀，喊着“不许走”，一个小头目说道：“我去找我爷爷。”

红军与彝民正在紧张混乱对峙着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前面山谷入口的地方，扬起一阵烟尘，几匹快骑飞奔而来，为首的一匹大黑骡子上，是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麻布斗篷、脸色微褐，看上去50多岁的汉子，身后个个是背着梭镖的剽悍青年。

他一到来，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了，通司认出这人正是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有了头人，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时机了。肖华要通司找小叶丹前来答话。当通司告诉小叶丹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时，他欣然同意了，并随即下马，喝退了集聚的人群。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边，刘伯承已在这里等候了。一见小叶丹，他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魁梧，后面有卫兵，知道这就是司令员，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坐在海子边，开始了诚挚、亲切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小叶丹想与红军结盟，还有另外用意。此时，他正与另外一个彝族部落“罗洪家族”械斗，小叶丹是沽基家族领袖，想借红军力量打败“罗洪”部落。

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刘伯承表示愿与小叶丹结盟。

结盟仪式在一个小山谷间海子边上举行。海子里的水清澈如镜，山峰和丛林倒映在水中，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海子边上，两只大碗中盛着清清

的湖水，一位彝民拿来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破开鸡嘴，鲜血滴在两只碗里，碗里的清水立刻变成了殷红色。

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高举大碗，刘伯承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起誓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这时，夕阳西下，余辉染红了海子水，山峰、树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余辉，海子边、山谷中，呈现着一派民族团结、友爱的气氛。刘伯承请小叶丹到红军驻地赴宴。小叶丹带着一群彝民首领欣然前往。彝族人善喝酒，刘司令员令把驻村所有的酒都买来，盛待彝族兄弟。

几杯酒下肚后，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带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你们的人，如罗洪家族来，我们要联合打他们，把他们打到林子里去，把全村给他们烧光。”

刘伯承深感小叶丹的义气和真诚，但他解释说：“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

饭后，刘伯承赠给小叶丹一面红旗，上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小叶丹喜形于色，兴奋地回到寨子里。

第二天饭后，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小叶丹走在红军的前头。红军与小叶丹结盟的消息早已传进村寨，十几名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列队欢迎红军过寨。成群结队的彝民，望着军纪严明、步伐整齐的红军走过了彝族区。

分手时，小叶丹握着刘司令员的手，依依不舍，刘伯承赠给小叶丹 10 支步枪，小叶丹深受感动，坚持把他的坐骑送给刘伯承。

刘伯承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打开了彝族区的通道，红军踏上了胜利的征程。

